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学刊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HAI

目 次 CONTENTS

◇ 文艺理论与文学评论 ◇

京派作家乡土文本的审美内核 ..... 胡西宛(1)

郭基南诗歌创作 60 年述评 ..... 张 明(7)

◇ 基础教育研究 ◇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的考察 ..... 胡学亮(11)

◇ 学科发展前沿 ◇

简要论述行为会计学个体研究的非经济因素 ..... 孙 云(18)

◇ 管理科学研究 ◇

管理滥用对员工组织报复行为作用机制研究 ..... 高 艳 闫巩固(24)

◇ 社会科学研究 ◇

当代乡村婚姻文化变迁的人类学研究 ..... 马 丽(30)

珠海微博舆情传播特性分析 ..... 赵华安 李传忠 许育秀(35)

◇ 金融与企业经营策略研究 ◇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对东亚国家经济的消极影响 ..... 赵鹤芹 周岳斌(39)

基于差异化战略视角探讨我国中小企业绩效研究 ..... 毕肖松 温 晓(44)

◇ 教学改革探索 ◇

一种基于系统科学的教学表达法 ..... 李膺春(49)

◇ 信息技术研究 ◇

基于 MATLAB 的 HDB3 码编译器的优化设计与实现 ..... 杨 戈 杨 乐(56)

基于高效能云服务平台的遥感数据分析与处理研究  
..... 杨博雄 倪玉华 刘 琨 陈红顺 贺 辉(61)

◇ 生物化学研究 ◇

吴茱萸、甘草浸提液对亚硝化反应清除 ..... 张 成 董侯燕 李 爽 曲悠扬  
唐梓意 蔡曙杰 杨 虹 颜亨梅(68)

黄花酢浆草总黄酮提取工艺及体外抗氧化作用的研究 ..... 吴 杰 覃 铭 颜 帅 罗 健(76)

# 试论 20 世纪京派作家乡土文学的审美内涵

胡西宛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 519085, 广东, 珠海)

**摘要** 废名、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乡土文学蕴涵了以下审美层面:人对世界和生命的原初体验、现代知识分子对民族文明的根源性的文化记忆、对“经典中国”的审美想象以及人性理想、生命理想和存在思考,寄托了他们对中华文明主体性价值和自我生命存在的审美观照,是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审美创造。他们的乡土写作既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精神,也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是中国现代作家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寻根之旅。他们在乡土文学具有“关键少数”的意义。

**关键词** 现代知识分子;乡土文学;文化记忆;经典中国;生命理想

乡土文学是 20 世纪中国的重要文学类型之一,学者孟繁华曾在分析这一文学类型的历史演变时,将其称为“百年来中国的主流文学”,认为“这个主流文学的形成,一方面与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中国□有关……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依靠的力量是农民,新政权的获得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的参与是不能想象的。因此,对乡土中国的文学叙述,不仅有中国本土的文化依据,而且有政治依据。”<sup>[1]</sup>可以说,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地层中不仅沉积着中西文化激荡、冲刷的痕迹,而且又因为自身文明传承、文化冲突、社会转型以及价值递嬗等复杂背景,累积了中国现当代文化精英们的多重文化思考和生命体验。

从 20 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创作实绩来看,在为数众多的乡土小说、散文、诗歌等文本背后,大致可总结出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思想,一类偏向“为人生”,如茅盾、叶紫等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以启蒙精神为核心,注重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另一类则带有某种田园牧歌般的审美情怀、理想主义的润色,而非现实主义的批判,如废名、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创作。这些作家大多为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把乡土营建成了一个独特的价值结构,他们笔下的乡土既是个体生命的起源,又是族群文明的载体,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故乡,蕴藏着多层审美涵义。这类知识分子以京派作家为代表。

“京派作家”目前在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界定比较复杂。有的学者认为“京派”就是指相对于上海

的“海派”而言的、活跃于三十年代北平和天津等地的一些作家,如沈从文、废名等,有特定的地域、时代所指,风格也具有独特性;有的学者对此的理解则比较宽泛,比如,关于周作人是否为京派的问题,有的人认为周作人的早期文学理论思想受到废名等人的推崇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部分作品也带有超脱、隐逸的思想倾向,因此将周作人也归入“京派作家群”,甚至按照文学理念、风格的倾向性,将创作风格与京派近似的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也归入“京派作家群”中。笔者对此争论不作评价,在本文的论述中为叙述方便,对“京派作家”取其广义,旨在讨论这类作品的共同审美特质,重在文本分析,而对其创作年代和作家创作风格的复杂性不作细致的区分。

## 1 乡土:根源性的文化记忆

乡土文学的原型多是作家本人的故乡,所以许多乡土文学都存在双重视角:知识分子视角和儿童视角。处于隐蔽状态的儿童视角,表明作家不自觉地以少年时代的眼光看待故乡。这种视角不止是角度问题,还具有过滤和着色功能。儿童视角天然、单纯,在乡村世界摄取了自然界的光景,而穿不透遮盖着成人社会恐惧和焦虑的幕布,使得童年记忆携着美和善变作一种幻美体验,写进人最初的生命过程中。这种个人早年的生命经验,记录了人对世界、对生命的原初体验,塑成了他的人格基底和价值观的源代码,并因日后成人世界负面经验的对比而日益增值,造成了一段理

想化的生命记忆,成为逝去的永远的美好,这是人类生命意识中的永恒之美。儿童视角的乡土书写正体现着人类对这种永恒之美的追怀。这是蜿蜒在乡土文本深处的一条生命意识之根,这种生命意识是乡土文学的多元价值中高度重合的部分。严厉审视传统文化的鲁迅,也还有温馨的百草园、童话般的海滩瓜地、乡风浓郁的社戏;以悲剧心态观照儿时故乡的萧红,也对故园故人和逝去的岁月一往情深;对乡村持有批判立场的莫言,也视故乡为原始生命力和激情的源泉。这种乡土追怀,隐含着作者对其生命源头的追踪的愿望和冲动,是人类对生命来路的无意识追怀。

而知识分子视角中的乡土则出现价值分野。周作人、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这些作家,以其文化理想、生命理想、人生经验和艺术观念把乡土酿成一种正向的文化价值。童年记忆被修改,在早年生命状态的理想化想象和幻美体验之上,还叠加着知识者对其文化母体、对其所属族类文明渊源的怀想和向往,以及对其历史文明价值的崇拜。这种乡土追忆不能仅解释为怀旧倾向,它是一种文化隐喻,折射着民族文明的历史影像。所以他们的乡土中还深深地扎着更为粗壮的文化之根。

《故乡的野菜》的表层内涵是作者本人的童年记忆:挽着苗篮采野菜的妇女儿童、“上坟船里的姣姣”、祭祀的乐队、浙东田野风光等风俗画面和自然景色,在其深层却叠印着中华文明早年的风姿:那是《诗经》中《关雎》、《卷耳》、《采芣苢》、《采薇》等篇章所记载的先民田野采摘的情景和男女相悦的场面,以及文化典籍中记载的各种民间礼俗。

《菱荡》中的乡土固化为一套完整的人文景观:瓦屋,石塔,农人,河水,渡船,竹林,花草。《边城》几乎就是这种景观的复制:木楼,白塔,山民,河水,渡船,竹林,花草;《受戒》再一次复制:院屋,庙,农人,河水,渡船,芦荡,花草……。这种蒙太奇式的组接,使乡村天地化作历史文化时空:自然环境、民居、宗教建筑、社群活动秩序井然,农事、民俗、宗教层次分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精神方式交相辉映。作家的乡土记忆暗含着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文化图式。

在这种统一的格局和型制中,环境特征以水最为突出,湖荡、河、溪环绕,使社会生活显得明艳、柔美、富庶、诗意;人物特征上表现为女性主人公居多,且以少女为主,《故乡的野菜》中有“嫁在

后门头”的“姊姊”、“上坟船里的姣姣”,《菱荡》中有二老爹的孙女儿、石家井的小姑娘,《边城》是翠翠,《受戒》是小英子、大英子,还有《竹林的故事》、《萧萧》、《大淖纪事》等等皆可为佐证。文本中这种内敛、宁静、阴柔、秀美的形象和由此呈现的诗性风格,就表现对象而论,体现了作者故乡江浙和两湖地区的自然与人文地理面貌和社会风情,是长江流域文明传统的表征;从作家的审美理想方面说,则流露了这些南方作家的古典婉约诗风倾向的审美情趣,可看作是这些作家审美意识中的美学原型;从文化资源上讲,体现了作家对上古文化、文学遗产的肯定和接受;这些文本中的采摘、踏青、祭祀等活动和相思故事等等,都体现了古典文学自诗骚以降对妇女活动的艺术表现。在这条文化源流中,氏族社会时代的文化痕迹也若隐若现。

两种视角下的乡土中,盘曲人类生命意识之根和民族文化之根,蕴含着根源性的生命记忆和文化记忆。这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乡土,成了人类生命意识和民族文明的载体。这使中国现代文学的乡土主题在世界文学中获得了独立价值。

## 2 “经典中国”: 中华文化形象的审美建构

考察这些乡土文本中的自然、社会和人,可发现其统一的审美特征,这主要体现为传统社会中人的生存的诗意性,包括生活环境的诗意性,生存方式的诗意性,人际关系的和谐,人性的美和健康,人的精神的完满自足等等。这实质上是对宁静、和谐、华美、诗意的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的文学摹写,是对以中华文明为核心价值的中国形象的诗性想象,一个巨大的文化形象——“经典中国”出现在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乡土文本中。

这些现代作家对“经典中国”形象的建构,集中表现为对传统社会的审美想象。这里采用的是典型的知识分子视角,体现的是典型的知识分子趣味,而这种趣味的培养与形成,要追溯到他们的启蒙时代:“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成为经典蒙童读物的这首宋诗,就是知识分子心中传统社会日常生活图画的简化版。而《故乡的野菜》绘成的浙东农村、《菱荡》的陶家村、《边城》的山水人家和《受戒》的庵赵庄,就

是这幅图画升级版。《菱荡》虚化时代背景，淡化故事情节，弱化人物性格，简化人的精神世界，刻意与表现对象保持距离，只以中景和全景表现陶家村这个传统民间社会的自然环境和日常生活型态。《受戒》更刻意突出乡间自然风光和传统社会风情。这些文本中描画的桃花、桑树、溪流、湖荡、田园、村舍、农人、蛙声、萤火、流星等等，全都是内涵具体清晰的传统中国意象。追根溯源，《桃花源记并诗》便是所有这类图画的经典版。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的诸种文本都隐含着陶渊明的文本，就连它们的文体特征都何其相像。

历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有这样一个桃源情结。他们钟情于传统社会的生态之美，欣赏乡民们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自在与自由状态，向往那种生存形式的诗性特征，而这些或许已成为全人类再也无法追回的生命价值。

《故乡的野菜》从民俗和文学的角度突出对传统社会的审美想象，最能代表知识分子的传统审美趣味。从乡间祭祀活动——清明扫墓，作者首先联想到的是鼓乐声中“上坟船里的姣姣”，和船头篷窗下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如果说这是作者个人的审美想象，那么，文本中展开的吴地三月三荠菜花开，“侵晨村童叫卖不绝”的情景，则向我们暗示了典出《临安春雨初霁》的诗意图景；春日里妇儿挽着苗篮采摘荠菜的叙述，更把我们引向《诗经》的《国风》、《小雅》中的先民风习；而“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等民谚和童谣中，又浮现出陶渊明笔下“童孺纵歌行，班白欢游诣”的景象来。考察《故乡的野菜》中隐含的众多文本，才发现它为我们系列地呈现了先秦的中国、六朝的中国、唐宋的中国、明清的中国。区区一把荠菜，竟可以接通遥远年代的民间生活和古典诗人的审美趣味，通向幽深的中国历史文化空间，展现经典的中华风物，诗性的中华精神。民俗的本土性，民俗的民族本己性，使周作人文本中的中国文化形象兼具色彩感与质感，文化内涵丰富，诗性特征突出。联系周作人的其他作品如《乌蓬船》、《喝茶》及“草木虫鱼”系列，可以发现，他以民俗学视角穿透现实生活、民间文化和中国历史，从共时性和历时性向度上为读者呈现了最具本土色彩的中国形象，其力度超过了前述三位作家在小说文本中的表现。

人性美和人情美是这些乡土文本的另一个内涵层面。一般认为这表现了作者的人性理想，但

我们还要看到，作者钟情的人物不外是中国的传统文明准则、道德理想的化身，体现的是儒家的伦理情感、道家的诗性人格、佛禅的生命觉悟等等精神风范。这说明他们强调的是体现在主人公道德原则、生命信念中的中华文明传统的核心价值。从这个角度看，表现人性美、人情美也是作者们“经典中国”建构工程的主体部分。

这些乡土文本对中华民族传统形象的审美想象，体现了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和人性理想，包含了中华文明的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组成了他们文明信念中永恒的“经典中国”。“经典中国”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文化记忆，全体华夏族裔的民族信仰。以中华传统文明为主体价值的“经典中国”形象，是起始于华夏人文初祖，各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共同参与，主流文化、民间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汇融合，经由不同时代继承、扬弃、发展，从而塑造完成的文化正宗、民族品牌，是具有文化本位意义的历史符号。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尤其醉心于其美与和谐的诗性特征。作为对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肯定，作为对人类文明永恒价值的追求，这与其他对传统文化持批判立场的作家并无价值上的冲突。正如周作人自己，既与“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一样尊崇西方科学理性，又醉心于从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化中寻找建设理想社会和人生的资源。对“经典中国”的审美想象，体现了这些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性思潮和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自觉的民族身份认同意识，和守护本民族主体文化价值的历史责任感。

当然，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原本并非擅于制度设计，桃花源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和谐安宁，唯一和“制度”沾边的也仅是“靡王税”而已，向上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无苛政”，这从政治学意义上看，似乎透露出些许无政府主义倾向；稍有制度设计痕迹的孟子，也多是鼓吹“发政施仁”一类士大夫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道德理想。有别于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关于政治、法律、经济等层面的理性规划，他们的理想国的基本价值是美、善和自由，凸显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社会理想的感性特征和审美特质，中国现代乡土作家也一样。但他们接过传统知识分子的人世情怀、“兼济”道义和审美趣味，把前辈代代描绘的社会理想塑造成民族形象，提升为文明信念，从而构建起了属于全球华人的

“经典中国”的审美形象。这是这些现代乡土文本的重要价值之一。

### 3 凝视中的“他者”：生命理想的投射

崇尚本真状态的生存，追求心灵的宁静、和谐与自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怀有的生命理想。上述乡土文本的主人公身上，多可见到这一理想的光芒。

这些乡村社会的生存者，总体上是真善美的化身，统一的精神特征则体现为真。“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自然”概念的基本内涵，指人精神的本真状态、生存方式的本然状态、生存环境的本然状态，总之，人既没有受到世俗环境恶质的污染，也没有背负现代社会加给的精神重压。《边城》中的翠翠、《受戒》中的小英子和明海，包括《故乡的野菜》中“上坟船里的姣姣”，是天然长成的生命，纯粹，健康；《菱荡》中的洗衣妇张大嫂、《受戒》中的村人，不受仪规、戒律的约束，淳朴，自由；《菱荡》中的陈聋子，与外部世界没有冲突，内心世界也没有波澜，与生俱来地保持着从容、淡泊、空明的心境，颇见禅的“静虑”风神。这些真善美者，因其生存的本真、良心的纯洁和灵魂的宁静，内心是和谐而自由的。

但这些人物的体现的本真的价值，与作者本人所持守的生命理想只是部分重合。作者是在一定距离之外以知识者的眼睛凝视他们的。文本中的叙述者置身事外，站在生命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制高点上。这显示作者肯定、欣赏并宣扬人物的人格品质和行为方式，却不将其认同为知识分子自己的独立价值，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不会把自己等同于一般野老村妇。人物们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知识状况，以及他们的民间信念和趣味等等，与知识分子的现实情状和核心价值差距甚大。人物们的本真和自在状态确是理想的，但也是知识分子们无法回归的；他们的简单、天真和粗俗也是知识分子们不能认同的。这些人物的生命理想的投射。在这样的人物中，找不到一个知识者形象，他们基本上是穷乡僻壤的村夫村妇、天真未凿的少男少女。倒是常见一群知识者和他们形成对照：《故乡的野菜》中有明显的乡村背景和知识背景的对照，《竹林的故事》中有一群读书人和三姑娘作对照，《萧萧》中有一群过场的女学生和萧萧作对照。

为什么知识分子的价值偏偏寄托在缺少知识

的传统乡间和底层农民身上，为什么不能正面建构起承载知识分子价值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呢？因为这缺乏现实合理性。在这些作家的现实世界里，找不到成功入世的、或成功出世的知识分子，只看见吕纬甫、涓生、倪焕之、高觉新、莎菲、汪文宣、方鸿渐们的苦难历程，以及此后知识分子精神的垮塌。现代知识分子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传统，也宿命般地重演了多数前辈在“穷达”——“出入”式的人生设计上的失败实践，也再无缘重返前辈们入世失败后寄情山水的独立自足的精神境界。因此，这些现代知识分子只好寄情乡间的纯朴生命，从“别处”寻找其生命理想，以艺术想象化解现实困境。

看来，这些本真的人物具有某种“他者”的意义。“他者是主体建构自我形象的要素。他者是赋予主体以意义的个人或团体，其目的在于帮助或强迫主体选择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并确定其位置在何处。”<sup>[2]</sup>正是这些“化外”的本真和健康的自在生存者，定义了“文明世界”里异化的生存者，知识分子们当然也包括在内。这虽然显示了作者一类知识分子潜意识中的优越感，以及与下层的距离感和区隔意识，但其本意则是借人物宣扬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生命理想，并对异化的生存现状作出批判。

### 4 面对乡野：解放的需求与想象

人物掩映在乡野的自然山水中，人与自然景物浑然一体，难分彼此，这是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的乡土文本中颇为独特的景象。在这里，自然景观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描写，甚至并非环境描写，它是和人物具有同等价值的艺术表现对象，具有独立意义。本质上，乡野蕴含着作者们想望的生存和生命的至高境界，这是这些作家的乡土写作最终到达的地域。“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田”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原始冲动，执着入世如孔子，也会情不自禁地附和寄情大自然的学生。归田的本义就是归向生命的本真和本位，归向知识分子的性灵空间。“归”是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永恒追求，已被写入他们的文化基因。现代作家的乡土书写可看作是他们归田的虚拟形式。

这些乡土文本中的乡野是自然山水，其中暗寓着生命与自然的原初关系的想象，是生命起源与归宿的象征；乡野与科学和商业文明保持距离，是本然世界和本然人性的象征；在佛家看来，自然界的一切无不是佛性和智慧的显现；在天然、和

谐、宁静、优美的意义上，乡野是精神解放的象征。乡野以其强大精神引力，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图腾。面对乡野就是寄情山水，寄情山水就是超越现实，找回和面对本心本性。因此，面对乡野就是体悟生存、洞见灵魂，其现实意义是暂时解脱世俗的羁绊、生存的压力、现世的苦难、肉体的束缚，终极意义则是重返自由心灵，获得宁静和愉悦，实现内心的空明清澈，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中国知识分子多愿接受身心二元论，把主体的心灵当作非物质性的实体，不论是主动进入，还是被迫退守，那里永远是属于个人的自由王国。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强大的现实阻碍也许难以克服，但营建个人性灵的空间则如蜘蛛缀网、蜜蜂营巢一样，不但擅长，而且出自本能。从本质上讲，它体现了积极思考人的解放的理想主义精神，这与向来对其所作的逃避现实的批评是有距离的。

在《菱荡》的乡野中，潜隐着一种存在秩序。“菱荡圩算不得大圩，花篮的形状”，“环着这水田的一条沙路环过菱荡。”“荡岸，绿草散着野花，成一个圈圈。”“走路是在树林里走了一圈。有时听得斧头斫树响，一直听到不再响了还是一无所见。那个小庙，从这边望去，露出一幅白墙”，“如果是熟客，绕到进口的地方进去玩，……或者看见一人钓鱼，钓鱼的只看他的一根线。一声不响的你又走出来了。”菱荡圩是封闭的圆环结构，在封闭的意义上，它是一个完整世界和自足系统，和陈聋子的生命特征同构，它对应和提示着陈聋子独立自足的精神状态，是自足精神的隐喻；在圆环的意义上，它在静态中蕴含着无始无终的运动，可看作是时间化的空间，它暗合中国民间的一种生命信念：循环观。给这种观念以支持的，除经验层面的四季与阴阳轮替、人世兴衰祸福往还，还有先验层面佛家的轮回允诺。依这种周行性的时间观和生命观，自然和生命存在表现为周而复始的无穷运动，具有无限性和永恒性。这算得上是传统文化关于时间和生命存在的哲学认识。封闭圆环形的菱荡就是这种生命观念的图示，所以它实质上是空间化了的时间。这个圆环中进一步布置了画龙点睛式的存在物：小庙、钓者、伸开手脚躺在大地上闭眼向天的人，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价值符号的加入，显现了主体与对象世界的一种特殊关系结构，这不是人与实践对象的关系，而是精神与它的客观对应物的关系：人在自然中瞥见自己心灵的镜像，识见存在的本相。这种人与自然对话的格局，透露出万物与我齐一、以有限融入无限的精神

欲求。具体到废名的文学语境，这显现了废名的读者常常体悟到的所谓“禅意”与“禅境”：在“静虑”中“自识本心”而进入静寂空灵的生命境界。菱荡的深林中传出的斧头斫树声，也引发读者朝向“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境界的联想，也是对禅意和禅境的一重印证。这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理解和喜好的“禅”吧。

当心灵与自然实现对话时，它就由世俗而超越，由有限而永恒，进而来到大解脱的圆满境界。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层生命体验，是对自我生命存在的审美体验和审美观照，对于生命的自由王国的自觉建构，是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生命价值追求，如马尔库塞所说，是“深入到人类生存纵深维度的解放的需求与想象。”<sup>[3]</sup>既带着宗教般的情感，也体现出强烈的存在意识，具有超越时代、社会和民族界限的价值。

以人物寄托知识分子的人性理想和生命理想，是这些乡土文本的显性的内涵层面，在乡野的自然山水中表现对生命境界的追求，则是这些乡土文本的隐性的内涵层面。

回望正消失在历史视野尽头的农业文明，以及与之相伴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审美方式，现代作家的这些乡土文本成了写给逝去的历史时空的挽歌；但守护着中华文明传统以及人性理想和生命理想这些属于全人类的永恒价值，又使周作人、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等人完成了一次现代作家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寻根之旅。

## 5 “关键少数”：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之一

在现代文学史上，废名、沈从文“京派”风格鲜明，汪曾祺则被认为是“京派”传人。周作人和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又是两对师生关系。沈从文和汪曾祺也都表示自己受过周作人和废名的影响<sup>[4]</sup>。这显然是一个有明确思想艺术传承关系的作家序列。流派和师承关系并不妨碍作家各自的独立思想和艺术个性，如果具体而论，四人作品的美学风貌是有显著差别的，其思想价值和思想资源也有很大不同。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乡土文本表达的文化理想和生命理想具有一致性，这集中体现在其乡土写作中对民族文明的根源性的文化记忆、对“经典中国”形象的审美想象以及他们的人性理想和存在思考上面。

然而，这种一致性，仅用流派或师承关系来解释又是不够的，它的精神根源在哪里呢？可以认

为,在于他们思考中国现代化问题时体现的牢固的民族主体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外来的异质性文化资源价值的警觉意识。一方面,这些现代知识分子并不是思想、政治上的守旧派,他们代代都秉承“五四”精神,都认可西方科学民主的价值,周作人对所谓西方新知的宣传、对封建文化的猛烈批判更是有目共睹;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是受中国传统文化透彻熏染的现代知识分子,如果简单举证,儒、释、道传统,古典文学与文化传统等等在四人身上都能够寻到确凿的印迹,自觉持守中华文明传统是他们的内在要求。与以激进姿态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既有认识西方文明正面价值的前提,又有固守本土文化主体性的理由,更有反省现代文明弊端的勇气,因为他们觉悟到某些现代性价值可能与其坚守的本土价值相悖。因此,本土价值自然成为他们乡土文本的主导意识。他们的家国情怀、他们崇尚的或儒、或释、或道的精神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文性格色彩的道德感情和对理想生命境界的崇拜,无不打着醒目的民族主体性的印记。这些不同层面的价值,在何处归于统一?统一在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与伦理共识的基础之上<sup>[5]</sup>。

中国终于逐步走向现代化了,并且还始料未及地迎来了全球化。当此之时,追求民族认同与伦理共识,已然成为主流的声音。而在当年的启蒙与现代化思考中,周作人、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在其乡土文本中表现的基于民族认同与伦理共识的文化守成主义立场,却处在边缘地位。立场的边缘性使得他们的文学史地位也一度边缘化,但正是这类边缘式人物,在当年充任了“关键少

数”的角色。关键少数之所以关键,原因在于他们的价值的无可替代性。这一价值的存在,形成了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偏误的矫正机制,形成了文化批判价值和和文化守成价值互补共生的思想生态。在反抗、破坏、创造、新生的呐喊声达到峰值的时刻,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但这微弱的声音却从来没有中断过。这也说明,他们与承担着批判、清算传统文化任务的知识分子阵营并不存在根本冲突,原因就在于双方的民族身份认同、文化生命理想和社会革新的使命感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固守的价值,如果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本民族“固有之血脉”<sup>[6]</sup>。如果更客观一点看,他们是中国近现代启蒙语境中文明对话的不可或缺的一方,他们的文化思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天然组成部分,是现代中国文明进步思想原动力中的主力之一。

## 6 参考文献

- [1] 孟繁华.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J].天津社会科学,2009(2)
- [2] (英)丹尼卡瓦拉罗著,张卫东等译.文化理论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29
- [3] (德)马尔库塞著,李小兵译.审美之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234
- [4] 沈从文.论冯文炳[M].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
- [?] 汪曾祺.万寿宫丁丁响[J].芙蓉,1997(2)
- [5] 郭齐勇、秦平.儒家文化:民族认同与伦理共识的基础[J].求是学刊,2006(6)
- [6] 鲁迅.文化偏至论[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56

## THE AESTHETIC CONNOTATION IN THE NOSTALGIA TEXTS OF MODERN WRITERS

HU Xiwa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hai, 519085, Zhuhai,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nostalgia texts, Zhou zuoren, Fei ming, Shen congwen and Wang zengqi had represented their particular imagination, including the cultural memory about the roots of life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 civilization, the imagination about Classical China, the ideal of human nature, and life ideal. It's an aesthetic creation that the ultimate concern involved, there is the common value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intellectuals inside.

**Key words** modern intellectuals; nostalgia literature; cultural memory

# 郭基南诗歌创作 60 年述评

张 明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 519085, 广东, 珠海)

**摘要** 郭基南是我国 20 世纪文学史上的一位著名少数民族作家,是锡伯族新文学的开拓者、奠基者之一。在近 70 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中,他不断开拓、坚持不懈,创作了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 300 余万字,多有上乘之作。他的作品思想性强,艺术性高,民族特色鲜明,是锡伯族人民现当代生活史与情感史的艺术写照。郭基南自觉运用双语创作自写自译,使得他的作品走出了家乡,走出了新疆,赢得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与声誉。

**关键词** 郭基南; 诗歌创作; 锡伯语; 抒情诗

郭基南是我国 20 世纪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锡伯族作家,是锡伯族新文学的开拓者、奠基者和重要作家之一,是老一辈少数民族作家中为数不多的用双语(汉语和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创作活动自 1939 年底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已历经 70 个春秋,在诗歌、小说、散文、散文诗、报告文学、戏剧文学、电影文学等创作领域广有建树,其中以诗歌创作的成就最为突出。从他的诗歌处女作《车夫怨》于 1943 年冬开始算起,到 2002 年底他出版了诗集《情感的火花》,这意味着他的诗歌创作活动至此已延续了一个甲子。此后,他并没有搁笔,而是暂时告别诗歌创作,转而开始了长篇小说和散文的创作,如此长的创作生命力和艺术热情在国内外作家中是很少见的。

目前,国内学者对郭基南诗歌的研究相当缺乏。就笔者所见,只有对他早期诗歌、上世纪 60 年代上半期及 80 年代初期诗歌作品的几篇评论,对他 60 年诗歌创作的整体专论性研究尚未见到,对这样一位创作丰富多彩的作家来说,这显然是不相称的。为此,本文拟对他的诗歌创作历程和有关的代表性作品做一梳理和评述。

郭基南长达 60 年的诗歌创作之路基本可归纳为三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创作(1939—1948)、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创作(1949—1965)、“文革”十年被迫停笔、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创作(1977—2000)。

## 1 第一阶段:诗歌初创期

郭基南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是他登上诗坛与文坛的起步、初创阶段。

郭基南 1923 年 1 月 1 日出生在新疆伊犁地

区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爱新舍里镇的一个农民家庭。1939 年的 12 月,他在《新疆日报》上发表了用汉文创作的处女作散文《一天的生活》,标志着他文学创作生涯的开始。1943 年冬,刚满 20 岁的郭基南创作了诗歌处女作《车夫怨》。该诗细致、真切地描述了一个旧社会的下等人、一个拉货的年轻车夫冻死在寒冷、凄凉的风雪旷野里的悲惨命运:“请转告我心爱的少妻,/别盼望我能返回家里,/黑夜夺走了我年轻的生命/……/冷酷的岁月在张口,/想把苦难的人们吞噬”<sup>[1]</sup>,对旧社会的冷酷与黑暗进行了愤怒的揭露与控诉。这首诗当时是用锡伯文写就的,曾经套用俄罗斯民歌《茫茫的大草原》的曲调被广为传唱,后来收入诗集时译成汉文。

1944 年夏天,郭基南创作了诗歌《祖母泪》。这是一篇叙事诗,共有 14 节 56 行。诗作以“我”的眼光为视角,通过“祖母”数次痛哭与诉说、“我”数次“打门挂灵幡”,描述了“我”的三个叔叔先后被旧社会的虎狼官吏迫害致死的悲惨遭遇和父亲因生活所迫、身患绝症、即将去世的凄惨景况。诗作的结尾通过祖母的质问,向当时的黑暗社会发出了愤怒的控诉:“我只问这暗无天日的岁月,/为何夺去了我铁塔般的四个儿子?!”<sup>[2]</sup>从艺术表现上看,此诗的整体框架明显运用了复沓的手法,使全诗回环照应、层层递进,造成一种荡气回肠的艺术效果。诗人后来回忆说,他是留着泪写这首诗的,因为他自己的家庭就有这样类似的遭遇。“这首诗中的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较明显地带有诗人身世的影子”<sup>[3]</sup>。

如果说郭基南诗歌创作的发轫之作偏重于叙事的话,那么他此后的诗作则逐渐转向了抒情。

1946年他发表了第一首自由体的抒情诗《野火》，诗人热烈地期待“从乌孙山下燃烧起来的野火”以它“奔腾的气势、炽热的烈焰”，去烧透那“冰冷的山谷、封冻的大地、漫漫的黑夜”，迎来“祖国绚丽的黎明”<sup>[4]</sup>。这里的“野火”意象，显然具有总体的象征寓意，它代表了希望之火、光明之火、斗争之火，代表了人民的意愿与力量。

1948年的春夏，郭基南满怀激情地集中创作了《春望》、《同情》、《致友人》、《我要弹奏》、《纪念》等抒情诗，表达了诗人痛恨“吃人的魔鬼，吸血的寄生虫”（《纪念》<sup>[5]</sup>）、深切同情深受封建主义“三从四德”摧残的具有和“祥林嫂”相同悲剧命运的各族妇女（《同情》<sup>[6]</sup>）、追求向往“东方的曙光”带来“春满人间”（《春望》<sup>[7]</sup>）的真挚情感。

郭基南在1939年至1941年期间，曾经从伊犁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参加了由茅盾担任负责人的“文化干部训练班”的学习，直接聆听了从内地赴边疆讲学的革命进步人士茅盾、张仲实、赵丹等人的授课，开阔了视野，接受了进步文艺的影响。所以他第一阶段的诗歌创作可以明显看到鲁迅、茅盾等“五四”新文学的著名作家对他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学习与借鉴，例如对杜甫诗歌的学习借鉴。他的《车夫怨》、《祖母泪》明显有着杜甫《三吏》、《三别》的影响。据诗人回忆，他的二叔是位很有学问的人，在他小的时候就教他读唐诗，特别是杜甫的诗歌。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参观了杜甫草堂后曾写道：“少时常在故乡里，/闻听老人赞子美；/唐韵世播伊河岸，/诗圣诗花心上开……”<sup>[8]</sup>，这就更加明确了杜甫诗对郭基南的熏陶与影响。总之，郭基南早期的诗歌创作可谓出手不凡、起点较高，对锡伯族的现代诗歌具有开拓、创新之功。

## 2 第二阶段：诗歌发展期

郭基南诗歌创作的第二阶段，是他在早期诗歌创作基础上的转型、发展阶段。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就在这一天，郭基南满怀激情地创作了诗歌《飘扬吧！五星红旗》：“一个旭日般光辉的新中国，/在亿万人民欢呼声中诞生。/无数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像美丽的吉祥鸟，/飞上了祖国的蓝天。”<sup>[9]</sup>后来诗人在回忆这首诗的创作过程时说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并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喜讯传来，全国上下一片欢腾。翻身的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这伟大的胜利！

当时，我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中。为表达人民火焰般炽热的感情和美好的心愿。我便即兴创作了《飘扬吧！五星红旗》这首诗，发表在锡伯文报纸上。”<sup>[10]</sup>这是一首颂歌，这是一个过渡，这是一个转变，这同时也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郭基南的文学创作将从“怨”、“泪”、“企盼”转变到“声声讴歌”、“幸福”、“欢乐”，标志着郭基南诗歌创作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诗歌创作的开始。然而，由于组织上安排他去担任学校和行政方面的有关工作，致使他的第二阶段的创作活动在刚刚开始后又推迟了整整10年。

1961年，郭基南担任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长任期届满后，他有较多的时间进行文学创作了。1962年他被调到新疆文联，成为了专业作家。从1961年至1965年，郭基南以诗歌创作为主，也写有报告文学和散文，使用的语种为汉语。

郭基南这一阶段的诗歌创作基本上是抒情诗，可分为政治抒情诗和生活抒情诗两大类。政治抒情诗有《我永远跟党走》、《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前进》等，表达了一位少数民族诗人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感激热爱之情。他这一阶段诗歌创作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生活抒情诗方面，其代表作主要有《早安，金色的伊犁河谷》和组诗《伊犁春色》。

《早安，金色的伊犁河谷》表现的是诗人家乡伊犁河谷清晨的绚丽多彩的秋色：“晨风在旷野里像骏马疾驰，/丰收的气息到处在散发、洋溢，/云雀在晴空中像灵巧的歌手，/翩翩飞翔啼奏着优美的迎春曲。/……过夜的畜群披着瑰丽的霞光翻过山梁，/宛如漂浮在绿色湖面上的花朵。/牧人的歌声多么喜悦、奔放、嘹亮，/悠悠地回荡在黎明的峡谷……”<sup>[11]</sup>该诗4行一节，共有9节；每行诗句约有十余个字不等，属于长句式的自由体诗，类似于同时期的全国著名诗人郭小川的“新辞赋体”。整首诗巧妙地摄取了故乡风貌的一瞬：秋季某天的黎明，镜头的聚焦是在“金色”二字，形象生动地描画了朝阳下家乡的美丽和丰收里人们的欢快，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对故乡的热爱和赞美，诗歌的风格既热烈又舒展。

《伊犁春色》表现的是伊犁河谷的一派大好春光：“一夜暖风过，/遍地冰雪消，/晓露润河谷，/明媚春光飘。/盈耳渔歌来，/撒网在河湾，/轻波吞笑语，/馈送鱼一船……”<sup>[12]</sup>此诗也是4行一节，每行诗句一律是5个字，体式规整，每节的第二行和第四行基本押韵，属于格律体。在这组诗歌中，体现出诗人对炼字炼句的讲究，如“晓露润河谷”

及其“润”字，“轻波吞笑语”及其“吞”字等，充分反映出郭基南诗歌所受到的唐诗和锡伯族传统诗歌的影响，其风格清新明朗、质朴健美。

上述二首诗融情于景、意境优美，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艺术魅力，是郭基南这一阶段诗歌创作的力作。此外，《草原晨曲》、《西行四首》、《山村之夜》、《四进乌鲁木齐》等生活抒情诗也都各具特色，给人以美的享受。

遗憾的是，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得郭基南和全国众多的文艺工作者一样，受到了残酷的迫害，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遣返回乡，在察布查尔县的一个农村中劳动。直到1974年8月才被“解放”，调到新疆幻灯厂当编辑。

### 3 第三阶段：诗歌成熟期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时已经53岁的郭基南又一次获得了创作上的新生。1977年1月他创作了长诗《周总理永远活在天山儿女的心里》，标志着郭基南诗歌创作的第三阶段——新时期诗歌创作的开始。

郭基南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创作可以称作成熟、丰收的阶段。该阶段的诗作，从数量到质量，从题材内容到艺术表现再到诗体的类型，都有较全面的提升、拓展与收获，这主要体现在了郭基南上个世纪80年代所出现的一个诗歌创作的高潮之中。在这10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创作的各种组诗、长诗、短章以及小诗共有170余首，题材广泛，类型众多，蔚为大观。在这些诗作中，既有延续了他60年代诗歌基本内容与风格的作品，如真情颂党的《心之歌》、歌抒家乡美丽风光的《草原是欢快的琴》等；但更大量、更为引人瞩目的，是那些和60年代诗歌相比更为内在、更具深层变化的诗作。这些诗作的变化主要体现为：

历史感的增强。诗人一如既往地以赤子的真情歌颂中国共产党、祖国、民族大团结，但由于赋予了历史的高度、长度，使得这类诗作深厚、凝重，富有力度。经过20年时间才定稿发表的长诗《用血肉写成的诗篇》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力作。全诗约100行，形象地历述了几千年来从汉、唐、元、明、清直至现当代的新疆与中原“骨肉来往不断”的大量史实，从而唱出了诗作的高潮：“天山的脉络连接着长白山的脉络，/……长江、黄河是祖国——母亲的乳汁，/一视同仁，哺育着众多子孙。/……愿伟大的民族友谊地久天长，/这是各族人民用血肉谱写的诗篇。”<sup>[13]</sup>这首诗情感真挚

厚重，史料丰富多彩，语言流畅舒展，总体押韵，一气贯通，是歌咏民族团结的一曲不可多得的“史诗”。此外，如《祖国母亲我深深地爱着您》、《彩色的花环》、《锡伯人民永远歌唱》等也是具有沉甸甸的历史感的政治抒情诗的佳作。

题材的拓展。随着诗人行踪的扩大和视野的开阔，郭基南的生活抒情诗已不仅仅是抒写家乡伊犁河谷农村新生活的现实景象了，而是有了相当大的拓展。《赛里木湖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哈萨克族的关于赛里木湖来历的凄惨的古老民间传说；《他们征服了一个旧观念》描写了锡伯族农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第一次把水果蔬菜当作商品进行销售的心理和观念的变化：“别再用旧索束缚自己了/……水果蔬菜的车辆源源开入市场”<sup>[14]</sup>。这一时期，诗人曾造访、游览、参观了内地众多的城市古迹、风景名胜，诸如北京、成都、昆明、大连、旅顺、重庆、上海、广州、深圳、沈阳、长春、海南、长江、黄河、三峡、滇池、石林、天涯海角、太阳岛、长白山等等，写下了大量的诗篇。例如《心上的长街》以北京的长安街为抒写对象，表达了诗人对首都风光的赞颂；《千里拜谒古草堂》描述了诗人参观杜甫草堂的所见所感；《花都昆明》描绘了花艳如醉的春城昆明的春景。其他诸如国际题材的诗，如《写在国际和平之年》；揭露抨击性的诗，如《当你》；有关家庭生活的诗，如《给妻子》、《给孩子》；讴歌众多普通劳动者的诗，如《记送奶员》、《钻井工人》、《话报童》；也都纷纷亮相。

在这些题材丰富的诗作当中，有两首关于锡伯族传统风俗文化的作品较为独特，值得注目。《孕育着——》描述了锡伯族民间文学活动的一种独特形式——“念说”：“众人围坐在灯烛旁/谛听那有趣的‘念说’/……/‘念说者’的朗读声/有如鸟语般委婉动听/闻听者的心神则是/全被带入书中的意境/……”<sup>[15]</sup>。《话除夕》反映出锡伯人过除夕的有关情景：“按照我们古老的传统习俗/除夕晚上总得要合家团圆/祖孙三代同桌共进晚餐/即使有外出的也摆个饭碗/……”<sup>[16]</sup>。其中的第一首更为新颖别致一些。

哲理诗的出现。这是郭基南诗歌体式中的一个新品种。创作于1982年的《沙砾集》中包括了43首哲理诗，是这一新品种的一次集中展示。这些诗大都是四行诗，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形象议论，富有哲理，给人以启迪和美感，有些类似于维吾尔族的“柔巴依”（四行诗）诗体。例如“自命不凡的青蛙虽然整天聒噪，/但谁承认过它是个歌手？/真正的歌手们自有定论，/他必须有夜莺

般动听的歌喉。”<sup>[17]</sup>其后创作的哲理诗《读书拾零》、《随感录》等在形式上则更为灵活多样。

1983年,郭基南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锡伯文诗集《心之歌》,这也是锡伯族文学史上的第一部个人诗集。198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汉文诗集《乌孙山下的歌》。

郭基南90年代的诗作有所减少。自由诗《伊犁河》、《祖国颂》、《啊!澳门回来了》等属长篇力作;数量相对稍多的格律诗体现出视野开阔、质朴明快、笔法纯熟的特点。例如写于1997年12月的《故乡吟》就显得十分成熟老道:“阔别多年今方归,/熟悉乡音迎耳来;/楼台满目花中立,/市井笑语云上飞。/路遇多是兄和妹,/伊水荡漾恋情在;/握手问好话衷曲,/共勉为国展风采!”<sup>[18]</sup>。

不难看出,郭基南新时期以来的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诗歌创作风格,在60年代清新质朴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深沉、舒阔的底蕴。

进入新世纪后的2002年12月,郭基南与自己的儿子、锡伯族青年诗人郭晓亮共同出版了锡伯文、汉文诗集《情感的火花——唱给岁月的歌》。该诗集收录了父子二人新时期以来的126首诗作及散文诗(含2首郭基南40年代创作的拾遗诗作),其中父亲郭基南的作品为111首。

## 4 结语

郭基南是我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中知名度很高的老一辈诗人、作家,是20世纪锡伯族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家。在其60年的诗歌创作历程中,他不断开拓、勇于创新、坚持不懈,创

作了大量上乘之作。他的作品思想性、时代性强,艺术性高,民族特色、风格鲜明,是锡伯族人民现当代生活史与情感史的艺术写照。尤其可贵的是,郭基南是锡伯族作家中自觉运用双语创作的代表性作家,他长期以来坚持不懈地用母语锡伯语、同时用汉语双向写作,自写自译,从而使得他的作品走出了家乡,走出了新疆,赢得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与声誉。笔者认为,当代文学研究界应该对郭基南的诗歌创作以及整个文学创作的研究予以重视和深化,如果本篇小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则令人欣喜。

## 5 参考文献

- [1-9][11-13] 郭基南. 乌孙山下的歌[z].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3,6,163,8,9,14,12,13,11,101,102,25,26,41,50,120,121
- [10] 郭基南. 我的自传[A]. 吴重阳 陶立璠. 中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传略续集[C].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235
- [14] 郭基南 郭晓亮. 情感的火花[z].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174
- [15] 郭基南 郭晓亮. 情感的火花[z].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196
- [16] 郭基南 郭晓亮. 情感的火花[z].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103
- [17] 郭基南. 乌孙山下的歌[z].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114
- [18] 郭基南 郭晓亮. 情感的火花[z].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306

# COMMENTARY OF GUO JINAN'S POETRY IN 60 YEARS

Zhang Ming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hai,  
519085, Zhuhai,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Jinan Guo, a Xibo poet, is a famous minority writer in the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in our country and one of the the Xibe new literary pioneers. A great many quality poetry had been written by Guo during his 60-year-period time Poet's career. Because of the lack of research on his poetry creation in present academic circles, this paper tried to review and summary his poetry creation process and each stage representative poems.

**Key words** Guo Jinan; Poetry creation; Course Magnum opus; Commentary

#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长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的考察

胡学亮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教育学院, 519085, 广东, 珠海)

**摘要** 日本在 1955 年至 1973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了地区间、城乡间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在经济高速增长前期,不论是在义务教育的机会上,还是在教育条件以及学业成就等方面曾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距,但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但没有造成这些教育差距的继续扩大,反而在短短十几年里义务教育获得了高水平的均衡发展,呈现出了经济高速增长与教育均衡发展齐头并进的特征。

**关键词** 日本;教育均衡发展;教育机会;教育条件;学业成就

## 1 前言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平均每年以接近 10% 速度持续增长,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史上增长幅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但是正如许多研究报告所显示的那样,我国长期的高速经济发展虽然带来了人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在经济收入、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逐渐扩大,尤其在教育方面更是如此:人们在享受教育资源、接受教育机会以及获得教育成就等方面的不平等现象日益突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的均衡发展已成为我国今后需要迫切解决的课题。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曾有与我国颇为相似的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发展历程,在 1955 年至 1973 年的 19 年里,日本国民经济保持了年均约 10% 的高速增长,被称为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sup>[1]</sup>。那么在此期间,日本民众在接受教育机会、享受教育资源以及获得学业成功方面的差异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断扩大? 还是逐步缩小? 其具体指标或数据又有哪些? 为此,本文以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长期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均衡发展问题为焦点,通过分析日本教育当局以及日本地方政府历年发表的教育白皮书、教育统计资料,考察日本在高速经济发展过程中,46 个都道府县<sup>①</sup>之间(以下简称地区间)以及同一都道

府县的城乡之间(以下简称城乡间)民众教育机会的差异及其变化情况。

## 2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长期地区间、城乡间民众义务教育机会的比较

**2.1 地区间义务教育的普及** 1947 年 3 月日本颁布的《学校教育法》,把义务教育的年限由二战前的 6 年延长至 9 年(小学 6 年、初中 3 年)。从全国范围看,9 年义务教育实施之初的 1947 年,日本全国小学和初中的就学率就分别高达 99.79% 和 99.57%,经济高速增长前期的 1955 年,这一比例达到了 99.77% 和 99.92%,其后二十年间微幅波动,到高度经济增长期的末期,小学和初中的就学率双双上升到了 99.98%<sup>[2-3]</sup>,在全国城乡各地几乎完全普及了免费的义务教育。

为了弄清日本不同地区之间义务教育普及率的差异,笔者分析了位于日本东北地区的山形县、关东地区的千叶县、中部地区的岐阜县和九州地区的熊本县等四个不同地区 1970 年的毛就学率<sup>②</sup>,其结果如表 1 所示。上述四县不仅分属日本几个不同的典型区域,而且各县民众人均年收入也有较大差异,其中千叶县人均年收入最高,位居全国 46 个都道府县中的第 5 位,属于日本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岐阜县的人均年收入居于全国

① 由于美军 1972 年才把冲绳县归还日本,因此本研究除非特别说明否则不含该县。

② 四个县的“毛就学率”是按以下方法计算而获得的,即毛就学率=学生数/学龄人口,其中,学生数是该县 1970 年所有小学 1~6 年级以及初中 1~3 年级共 9 个年级的在籍学生总数,学龄人口为该县 1970 年 6~14 周岁的 9 个年龄阶段的学龄儿童人数。本文中其它所有的“毛就学率”都按此方法计算,不再另注。

第16位,民众的富裕程度中等偏上,而山形县和熊本县的人均年收入排名比较靠后,尤其是熊本县人均收入全国倒数第二,是日本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sup>[4]</sup>从表1可以看出,上述四县虽然所处地理位置、民众富裕程度不尽相同,但各县之间义务教育的毛就学率,并未出现较大差异,富裕程度比较低的山形县和熊本县的义务教育的毛就学率都超过了100%,反而稍高于平均年收入较高的千叶县和岐阜县。

表1 1970年地区间义务教育的毛入学率比较

地区	毛入学率/%		县民人均年收入/日元	
	小学	初中	人均收入	全国排名
山形县	101.46	101.21	536,950	第36
千叶县	97.16	98.70	784,800	第5
岐阜县	99.98	99.20	654,081	第16
熊本县	101.35	102.26	479,746	第45

资料来源:山形県統計年鑑(1970年)、樫裡導摺寢護媽(1971年)、岐阜県調査書(1970年)、熊本統計年鑑(1972年)。

**2.2 城乡间义务教育机会的均等** 这里首先以山形县为例,对日本城乡间义务教育机会的差异进行分析和考察。高速增长中期的1963年,山形县人口总数为127万余人,其中都市人口占61.5%<sup>[5]</sup>,从事农林渔业等第一产业人口比例高达51.8%,位居日本46个都道府县的第7位,人均收入11万多日元,排名第32位<sup>[6]</sup>,属于经济发展比较滞后的农业县。该县当时有山形、米泽、鹤冈等12个市区和东田川、西田川、最上等9个郡34个町村的农村地区。笔者根据1962年至1975年出版的《山形县统计年鉴》中有关数据,计算出了山形县12个都市(城市地区)和34个町村(农村地区)不同时期义务教育的就学率,结果发现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学龄儿童的义务教育的毛就学率都接近或超过100%(表2)。

其次,以山形县内最大都市山形市与最偏僻山村白鹰町、饭丰町为例,进一步探讨工业化发展程度迥异的城乡间义务教育就学率差异情况。山形市是山形县府所在地,也是山形县经济、文化中心,还是日本东北地区核心都市,工业化发展程度较高,1973年全市52243个住户中,专业农户仅占2%。而白鹰町、饭丰町属于山形县两个人口稀少的边远山间地区,1973年专业农户的比例分

别为69%和67%<sup>[7]</sup>。表3是中心都市山形市与边远农村白鹰町、饭丰町的义务教育毛就学率的比较表,由此表不难看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无论是中心都市还是边远农村的民众都享受着颇为均等的义务教育机会。

表2 山形县城乡义务教育的毛就学率

年份	城市地区			农村地区		
	学生数	学龄人口	毛就学率	学生数	学龄人口	毛就学率
	人			人		
1962	153 853	146 026	105.4%	124 478	114 126	109.1%
1965	137 317	134 389	102.2%	101 393	98 177	103.3%
1968	127 447	126 412	100.8%	77 006	74 942	102.8%
1971	118 313	117 778	100.5%	63 923	62 382	102.5%
1973	113 317	113 631	99.7%	56 133	54 794	102.4%
1975	110 950	111 144	99.8%	50 516	49 371	102.3%

资料来源:1962年至1975年的《山形県統計年鑑》。

表3 中心城市与边远农村的义务教育毛就学率的比较

地域类型	地域名称	农户比例	毛就学率/%		
		1973年	1962年	1968年	1973年
中心城市	山形市	2%	103.7	99.5	99.1
边远山村	白鹰町	69%	110.9	103.6	102.3
	饭丰町	67%	110.6	102.3	103.2

资料来源:1962年至1973年的《山形県統計年鑑》。

### 2.3 特殊需要儿童的义务教育机会的保障

尽管日本在经济增长期的义务教育普及率几乎达到100%,但每年仍有千分之几的学龄儿童长期休学。如1952年日本全国失学儿童数量为55190名,其中因身障(包括聋哑、身体或精神薄弱)因素而失学的儿童最多,占总数的53.0%,其次是经济因素,占32.0%<sup>[8]</sup>。

为了保障这些特殊儿童的教育权益,日本除了对经济困难地区或家庭采取经济上的特殊援助之外<sup>①</sup>,还特别对患有精神或身体障碍的学龄儿童开设特殊学校、养护学校或特殊班级。据统计,高速增长期之初的1953年,日本全国只有159所特殊学校(盲学校和聋学校)和4所养护学校,在读学生仅为19281人,<sup>[9]</sup>而到了1974年,在特殊学校或班级就学的中小學生上升到了194100人,是前者的19倍,在这些特殊教育机构就读的儿童数占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读学生的比例也从1959年的0.29%上升到1975年的

① 如1950年制定的《生活保障法》规定国家对生活困难的国民,根据其困难程度采取适当保护,保证其最低限度生活并促进其自立。此方面的具体内容拟在其它论文中详细考察,这里不再赘述。

1.2%。<sup>[10]</sup>

另外,以1969年为例,日本有73.3%的听觉障碍儿童、54.0%的行动不自由(肢体残疾)儿童、44.1%的视觉障碍儿童、40.8%的智障儿童在各种特殊教育机构接受义务教育。<sup>[11]</sup>这样,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让身患各种障碍的儿童也获得了义务教育的机会,保障了更多儿童能够享受到义务教育的实惠。

### 3 地区间、城乡间民众义务教育条件的比较

#### 3.1 地区间、城乡间义务教育经费的比较

**3.1.1 地区间中小学人均教育经费**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教育投入规模逐年扩大,1955年日本教育预算为3713亿日元,<sup>[12]</sup>1962年增长为1.1兆日元,1973年更高达6.2兆日元,19年里教育经费增长了17倍左右,教育预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保持在5.7%到6.8%之间的高水平上。<sup>[13]</sup>而义务教育经费占整个教育预算的比重最大,在50年代初一度接近70%<sup>[14]</sup>,1960年之后虽有所降低但基本保持在53%到62%之间<sup>[15]</sup>。那么如此庞大的教育经费在地区间、城乡间的分配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呢?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日本地区间教育经费的分配情况。图1是日本1950年至1970年(小学至1968年)46个都道府县小学和初中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标准偏差的变异系数推移图,由图可知,虽然日本不同地区学生人均经费存在一定差距,但随着经济发展,其差距有逐年缩小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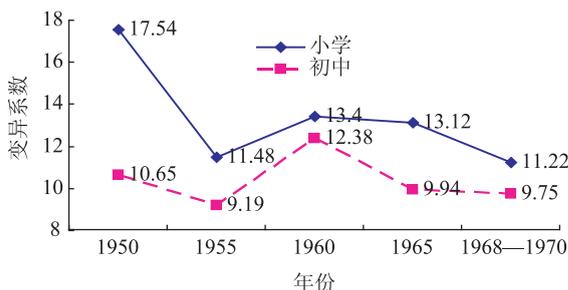


图1 地区间中小學生人均教育经费标准偏差的变异系数

资料来源:[日]文部省,我が国の教育の水準(1970年)。

例如,1962年日本全国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平均值为29879日元,超过平均值的只有东京

都和京都府,并且最高的东京都是最低的左贺县的1.94倍,<sup>[16]</sup>但是6年后的1968年,全国小学人均教育经费的平均值上升到了80163日元,超过该平均值的除了东京和京都之外,还有高知、奈良、富山、鸟取等18个县,人均教育经费最高的东京是最低的长崎县的1.69倍,而都道府县之间初中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就更小,<sup>[17]</sup>如果考虑到物价的因素,两者的实际差距应该更小<sup>①</sup>。

**3.1.2 城乡间中小学人均教育经费:**以熊本县为例 据熊本县《教育要览》统计,1978年熊本全县教育经费为533.1亿日元,其中熊本市、八代市、宇土市等11个城市的教育经费合计为262.8亿日元,其它87个町村的农村教育经费合计为270.2亿日元,<sup>[18]</sup>城市地区的教育经费略低于农村地区的教育经费。如果再考虑到人口因素,如1980年11个都市区人口合计约为98万人,农村地区约为81万人<sup>[19]</sup>,城乡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就更加明显,即11个都市的人均教育经费为26816日元,87个町村的人均教育经费为33352日元,农村比城市的人均教育经费高出了24%。

从中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看,1978年度熊本县小学生人均经费为130361日元,初中为152398日元。熊本县政府所在地的熊本市小学生、初中生的人均教育经费分别为121676日元和130118日元,均比全县平均值低6.7个百分点和14.6个百分点。其它10座城市中,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高于全县平均值的只有人吉市、水俣市、本渡市等三座城市,初中生人均教育经费高于全县平均值的仅有八代市和牛深市。与此相反,农村小学生和初中生的人均教育经费大都高于全县平均值,其中田原村的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为1014208日元,是全县平均值的7.8倍,久木野村的初中生人均教育经费高达1949052日元,为全县平均值的12.8倍<sup>[20]</sup>。所以单从1978年的数据看,该县教育经费反而大幅度向农村倾斜。

**3.2 地区间、城乡间师资力量的比较** 为了弄清日本不同地区义务教育师资力量的差距,笔者根据日本教育白皮书《我国教育水平》(1975年)的有关资料,对1975年日本各地小学和初中的师生比、拥有大学本科学历教师的比例以及教师的平均年龄进行了分析,发现46个都道府县可以分为

① 如据1961年的《熊本县统计年鉴》统计,1960年时,东京1千克大米的单价为97.7日元,而长崎县为85.0日元,左贺县为76.0日元。

三种不同类型,其特征如下:

一是埼玉、千叶、东京等地的师资特征,这些都道府县的小学和初中师生比、大学毕业的教师比例一般都高于全国平均值,但教师的平均年龄一般都低于全国平均值。如神奈川县公立小学的师生比为 29.6,比全国平均值高出 4.6 人,大学学历的教师比例为 60.7%,比全国平均值高出 24.8 个百分点。二是青森、岩手、熊本等县的师资特征刚好与上述的第一类型地区的情况相反,即这些都道府县小学和初中的师生比和大学学历的教师的比例一般都比全国平均值要低,但教师的平均年龄一般要高于全国平均值。如秋田县公立初中师生比、大学学历教师比例均低于全国平均值 2.4 和 11.2 个百分点,教师的平均年龄反而比全国的平均值高出 1.9 岁<sup>①</sup>。三是上述两种类型之外的一些都道府县,在上述 3 个指标方面大都比较接近全国的平均值<sup>[21]</sup>。

也就是说,在日本都市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如东京、大阪、京都及其周围地区的小学和初中的师生比较大、教师学历比较高、年轻的老师比较多,而都市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如东北地区、九州地区的一些县,中小学的教师特征正好相反。总体来说,日本大部分都道府县之间义务教育阶段的师生比、教师学历、教师年龄等师资力量的指标比较接近,其差距不甚悬殊。

另外,城乡之间的义务教育的师资力量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有逐渐趋向均衡的倾向。例如根据岐阜县统计科的调查,该县 1955 年 12 座城市的小学生师生比为 1:39,而农村为 1:31;市区初中师生比约为 1:33,而农村为 1:25。到了 1975 年,市区小学师生比降低到 1:28,农村小学师生比却降到了 1:21;市区初中的师生比大幅降到了 1:23,农村初中的师生比更降低为 1:17<sup>[22-23]</sup>。

### 3.3 地区间、城乡间义务教育设施的比较

#### 3.3.1 各地学校营养午餐的普及程度

二战之后日本开始在小学和初中开始实施营养午餐制度,当初营养午餐的实施率在地区间、城乡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如 1952 年,日本 46 个都道府县当中,享受营养午餐的小学和初中生比例超过 80% 的有东京都、爱知县、冈山县、福冈县等 6 个

地区,而其比例小于 20% 的有青森县、岛根县、宫崎县等 6 个地区,尤其是宫崎县,享受到营养午餐的学生只占全体学生的 1.2%,与东京、爱知等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都市与农村的实施情况看,同样是 1952 年,约 386 万都市的小学、初中学生中有大约 366 万的学生享受到了校方提供的营养午餐,其比例高达 94.8%。然而约 200 万农村地区的学生当中只有 58 万左右的学生获得了营养午餐,其比例为 28.9%,城乡差异显著<sup>[24]</sup>。

但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上述现象发生很大变化。如 1970 年,日本全国小学生中完全享受学校营养午餐的比例达到了 92.0%,另外给学生提供零食或牛奶的比例约为 6.1%,两者合计为 98.1%<sup>[25]</sup>,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急剧缩小。

仍以熊本县为例,1967 年该县 823 所小学和初中当中,有 572 所学校向学生提供营养午餐,<sup>[26]</sup>其比例为 69.5%。到了 1980 年全县 779 所中小学中有 732 所学校实施了营养午餐制度<sup>[27]</sup>,其比例达到了 94.0%。那么,城乡之间的学校情况又是如何呢? 1967 年熊本县 11 个都市共有 174 所小学和 74 所初中,其中,提供营养午餐的小学 and 初中分别为 151 所和 17 所,其比例分别是 86.8% 和 23.0%。另一方面该县农村地区设有小学和初中 426 所和 173 所,实施营养午餐的学校分别为 339 所和 67 所,其比例分别为 79.6% 和 38.7%<sup>[28]</sup>。也就是说,都市实施营养午餐的小学比农村要多约 7 个百分点,而初中反而比农村少 15.7 个百分点。但是到了 1980 年,城市小学和初中的营养午餐比例分别为 98.9%、94.4%,农村小学和初中的营养午餐比例分别是 98.2% 和 97.1%,城乡小学和初中实施营养午餐的比例变得非常接近(图 2)<sup>[29]</sup>。

不仅如此,该县一百多所偏僻学校实施营养午餐的情况也表现出同样趋势。所谓偏僻学校按照日本文部省的规定就是那些“交通条件以及自然、经济、文化等条件极差的山间、离岛等地域”的学校<sup>[30]</sup>。熊本县 1967 年有偏僻学校 115 所,实施营养午餐的学校比例为 45.2%<sup>[31]</sup>,1980 年有偏僻小学 140 所、初中 38 所,提供营养午餐的学

① 1975 年日本全国公立初中的师生比、教师的大学学历比例以及教师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20.2 人、58.0% 和 39.6 岁([日]文部省大臣官房. 我が国の教育の水準(昭和 50 年)基础表 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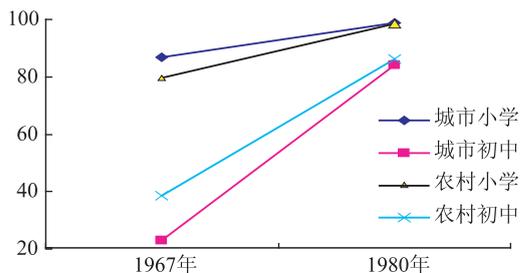


图2 熊本县城乡中小学实施营养午餐的比例推移图

资料来源：[日]熊本县教委《教育要览》(1967、1980年)。

校比例分别为 94.3% 和 97.0%，其提供营养午餐的小学比例比其它地区学校略低，而初中的比例高出其它地区十几个百分点<sup>[32]</sup>。

**3.3.2 熊本县城乡学校体育设施的比较** 如前所述，熊本县在行政区划上设有 11 个都市和 87 个町村，11 个都市里有小学 180 所、初中 75 所，另外 81 个町村共设小学 385 所和初中 139 所。表 4 是 1980 年这些学校体育设施的调查结果。

表 4 熊本县城乡间学校体育设施的比较

		游泳池	室内体育馆	灯光运动场
都市	小学	71.7%	83.9%	12.2%
	初中	62.7%	90.7%	47.1%
农村	小学	68.3%	82.3%	12.7%
	初中	74.8%	91.4%	28.3%

资料来源：[日]熊本县教委《教育要览》(1980年)。

表 5 日本城乡间学业成绩水平(1962、1963 年)

地区类型	小学				初中				
	语文	算术	社会	理科	语文	社会	数学	理科	英语
大都市住宅区	68.0	52.2	60.4	61.2	62.3	49.0	50.3	50.5	61.8
大都市工业区	60.4	49.6	56.8	58.4	53.5	46.0	46.8	47.3	57.0
一般城市	61.2	46.8	56.0	57.6	55.5	43.8	43.3	46.0	55.8
一般农村	61.2	45.6	54.4	56.8	53.0	42.0	41.3	45.0	54.3
偏僻农村	52.8	38.0	48.0	52.4	36.5	36.5	34.3	40.5	45.3

资料来源：[日]文部省，我が国の教育の水準(1964年)。

表 6 日本城乡间学业成绩水平(2008 年)

地区类型	小学				初中			
	语文 A	语文 B	算术 A	算术 B	语文 A	语文 B	数学 A	数学 B
大都市	66.5	52.1	72.8	53.4	73.6	61.3	63.6	49.6
核心城市	66.9	51.1	72.5	52.0	74.0	60.9	64.2	49.8
一般城市	65.1	50.0	72.0	51.1	73.5	60.6	62.8	48.9
一般农村	64.1	48.8	71.3	49.6	73.4	60.3	61.8	48.3
偏僻农村	62.8	47.2	69.5	47.7	73.1	59.4	59.6	46.7

资料来源：[日]文部科学省，平成 20 年度全国学力・学習状況報告書のポイント。

由表可知，室内体育馆的设置比例，都市的小学比农村稍高，但都市初中室内体育馆的设置比例反而稍低于农村。在游泳池的设置方面，都市小学和初中的比例都低于农村学校，而在夜间能够使用的室外灯光运动场设置比例方面，城乡小学基本持平，但城市的初中高出农村近 20 个百分点<sup>[33]</sup>。

## 4 地区间、城乡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成就的比较

**4.1 地区间、城乡间中小学学业成绩** 首先从 1960 年初日本文部省在全国实施的小学及初中学业水平测试结果看，日本不同地区以及城乡之间中小学生的学业成绩存在明显差距。表 5 是日本文部省根据 1962、1963 年学业测试结果统计出来的不同地域类型的小学和初中学生的主要科目得分。<sup>①</sup>该表显示，不管是小学 4 门学科还是初中 5 门学科，学生学业成绩基本上都是按都市住宅区、都市工业区、中小城市、一般农村、偏僻农村的顺序下降，尤其是都市住宅区和偏僻农村学校之间学生学业成绩差距非常明显<sup>[34]</sup>。

一度被中止的日本全国统一学业水平测试，相隔四十多年之后又恢复举行。从恢复之后日本全国学业测试结果看，日本地区间、城乡间的学生

① 小学语文和算术是 1962 年的全国统一测试结果，其它科目是 1963 年的测试结果。

平均学业成绩变得相当接近,地区间的学生成绩的差异也大幅度缩小。以2008年的测试结果为例(参见表6),大都市与偏僻农村的小学生,在语文A、语文B以及算术A、算术B<sup>①</sup>方面平均成绩的差距分别为3.7分、4.9分、3.3分和5.7分,而两者在初中语文、数学等科目方面的学业成绩的差距更小,如1963年大都市与偏僻农村学生语文平均成绩相差25.8分,而2008年其差距缩小为0.5分(语文A)<sup>[35]</sup>。不仅如此,日本学生在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IEA)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历年来的国际教育水平评估中,都表现不俗,各项指标位于世界前列。例如日本初中生的数学成绩,在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1964年组

织实施的第一届国际教育成就评估中获得第二名,在1981年的第二届评估中获得第一名;日本初中的理科成绩也在该协会举行的第一届(1970年)和第二届(1983年)评估中分获第一名和第二名<sup>[36]</sup>。因此,日本义务阶段的教育水平并没有因为重视教育的平等而影响教育的“效率”。

**4.2 地区间、城乡间高中升学率**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日本全国初中升入高中的升学率(以下简称高中升学率)也急剧上升,由1953年的50.8%<sup>[37]</sup>上升到1975年的91.9%<sup>[38]</sup>,为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进一步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么,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地区间、城乡间的高中升学率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表7 日本地区间高中升学率的比较

	1958年	1963年	1965年	1970年	1975年
最高	东京 74.0%	东京 84.3%	东京 86.8%	东京 94.4%	广岛 97.3%
最低	宫崎 35.7%	宫崎 47.8%	青森 54.3%	青森 63.3%	福岛 84.2%
差值	38.3%	36.5%	32.5%	28.1%	13.1%

资料来源:[日]文部省大臣官房.我が国の教育の水準(1964年,1975年)。

首先看看日本地区间(46个都道府县之间)高中升学率的差异及其变化情况。1958年日本全国高中升学率的平均值为53.7%,升学率最高的东京都是最低的宫崎县的1.93倍,两者相差约38个百分点<sup>[39]</sup>,其后,都道府县之间高中升学率的差距逐年缩小,到1975年,日本全国高中平均升学率上升到了91.9%,广岛县取代了东京都成为升学率最高的县(97.3%),但它仅为最低的福岛县的1.15倍,两者之间差距缩小为约13个百分点(表7)<sup>[40]</sup>。

都市化程度较低地区的高中升学率快速上升,是日本地区间高中升学率差距急剧缩小的主要原因。如在1965年到1975年的10年时间里,青森县的高中升学率增长了31.8%,其它33个县的升学率也提升了20多个百分点,这些县大都位于东北、九州、北陆、四国等地区,而城市化程度较高的东京、大阪、广岛、冈山等地的高中升学率原本就比较高,其增长的速度就相对较缓慢<sup>[41]</sup>。

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城乡间高中升学率的差距也变得越来越小。再以熊本县为例,1980年该县都市区初中毕业生为14916名,其中有14065人升入高中、317人就业、无业者105人、死亡者4人;町村(农村)地区初中毕业生为13123人,其中升学者12125人、就业者464人、无业者53人。都市地区的升学率为94.3%,比

农村地区略高1.9个百分点,而农村地区的就业率为5.9%,比都市区高2.4个百分点<sup>[42]</sup>。因此,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使得城乡初中毕业生在升学、就业等方面的差距几乎消除,义务教育获得了较为均衡地发展。

## 5 结语

日本在1955年至1973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了地区间、城乡间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日本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是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获得的。在经济高速增长前期,不论是在义务教育的机会上(如身障及智障儿童、偏僻山村的教育机会),在教育经费、师资、设备(如体育设施)上,还是在学业成绩、毕业升学等学业成就方面曾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距,但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但没有造成这些教育差距继续扩大,反而在短短十几年里义务教育获得了高水平的均衡发展,呈现出了经济高速增长与教育均衡发展齐头并进的显著特征。

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初,其人均收入不及美国的1/8、瑞士瑞典的1/5、英国的1/4<sup>[43]</sup>,为什么在这样的经济、社会环境之下,不是优先考虑教育的“效率”而是重视教育发展的公平与平等呢?他们针对教育机会、教育条件等诸多不公平的问题,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这些政策有多大

① 试卷A主要检测学生的基础知识,而试卷B主要检测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

的效果？这些效果又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挥出来的？这些问题将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要主题。

## 6 参考文献

- [1] [日]蓮見音彦,山本英治,高橋明善.日本の社会1:変動する日本社会[M].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7.46-47
- [2][8][9][24][日]文部省.我が国教育の現状—教育の機会均等を主として(昭和28年)[R].东京:日本文部省,1953.57,57-59,57-58,86-91
- [3][日]文部省.我が国の文教施策—社会の変化に対応する初等中等教育(平成元年)[R].东京:日本文部省,1989.534-535
- [4][日]熊本県企画開発部統計調査課.熊本県統計年鑑(往檻48獲)[R].熊本:熊本県企画開発部,1975.358
- [5][日]山形県統計年鑑(昭和38—39年)[DB/OL].<http://www.pref.yamagata.jp/ou/somu/020052/data/archive/s24-s63/s38.39.xls>
- [6][12][14][16][34][37][39][日]文部省.我が国の教育水準(昭和39年)[R].东京:日本文部省,1964.11,211,208,210,80,13,13
- [7][日]山形県統計年鑑(昭和48年)[DB/OL].<http://www.pref.yamagata.jp/ou/somu/020052/data/archive/s24-s63/s48.xls>
- [10][13][15][21][38][40][41][日]文部省.我が国の教育の水準(昭和50年)[R].东京:日本文部省,1975.45,186-187,186-187,276-278,18,18-19,19-20
- [11][17][25][日]文部省.我が国の教育の水準(昭和45年)[R].东京:日本文部省,1970.16,271,99
- [18][20][27][29][32][33][42][日]熊本県教育委員会.教育要覧(昭和55年)[R].熊本:熊本県教育委員会,1980.130-133,130-133,46-47,44-47,46-47,37-40,52-53
- [19][日]熊本県企画開発部統計調査課.熊本県統計年鑑(往檻55獲)[R].熊本:熊本県企画開発部,1982.32
- [22][日]岐阜県統計書(昭和28年)[DB/OL].<http://www.pref.gifu.lg.jp/kensei-unei/tokeijoho/gifuken-tokeisho/mainendeta/S28.html>
- [23][日]岐阜県統計書(昭和50年)[DB/OL].<http://www.pref.gifu.lg.jp/kensei-unei/tokeijoho/gifuken-tokeisho/mainendeta/S50.html>
- [26][28][31][日]熊本県教育委員会.教育要覧(昭和42年)[R].熊本:熊本県教育委員会,1967.104,105-106,107-108
- [30][日]日本教育社会学会.新教育社会学辞典.东京:东洋馆出版社,1986.778-779
- [35][日]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平成20年度全国学力・学習状況報告書のポイント[EB/OL].[www.nier.go.jp/08chousakekkahoukoku/01chousakekka\\_houkokusho\\_point.pdf](http://www.nier.go.jp/08chousakekkahoukoku/01chousakekka_houkokusho_point.pdf)
- [36][日]文部科学省.国際教育到達度評価学会(IEA)国際数学・理科教育調査(中学校)[EB/OL].[www.mext.go.jp/b\\_menu/shingi/12/chuuou/toushin/pdf/8.pdf](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12/chuuou/toushin/pdf/8.pdf)
- [43][日]文部省.我が国の教育の水準(昭和34年)[R].东京:日本文部省,1959.2-4

# THE SITUATION OF BALANCED—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BETWEEN REGIONS A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JAPAN'S ECONOMIC BOOM PERIOD

HU Xueliang<sup>1)</sup> ZHANG Mei<sup>2)</sup>

(1)(School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hai, 519085, Zhuhai, Guangdong, China);

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zhen University, 518060,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Prior to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economic, there were gaps in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educational expenses, teaching staff, educational conditions, student performance, as well as in college enrollment rate(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However, these gaps were narrowed; and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developed evenly to a high level within dozens of years when the Japanese economy experienced fast growth. Thus this article was to analyze this phenomenon based on a quantitative study.

**Key words** Japan; educational balanced-development;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educational conditions; student performance

# 行为会计学关于个体行为非经济因素的研究

孙 云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国际商学部, 519085, 广东, 珠海)

**摘要** 行为会计学是会计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的边缘学科, 主要研究人类行为对会计信息乃至会计系统的影响, 以及会计信息对人类行为和行为决策的影响。在行为会计学研究中, 有一类研究是以传统经济学模型中关于个体行为的假设为主要理论依据的。假设认为, 自利是个体主要的行为指导因素之一; 而运用结果的货币化是唯一可信的衡量方法。然而, 众多研究表明, 个体的行为并非以自利为主要的行为指导, 而是遵从一些社会准则, 诸如公平、诚实、合作愿意等。这些研究表明, 个体很容易会作出非自利行为。并且, 这些研究也阐述了个体对于平等的感觉及他们在失去平等时的行为表现。由此可知, 行为会计学在个体研究方面关注了许多非经济要素, 例如文化、伦理道德和情绪等因素。这是值得重视的研究取向。

**关键词** 行为会计学; 个体研究; 非经济因素

## 1 导论

行为会计学 (Behavioral Accounting Research) 是会计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的边缘学科, 主要研究人类行为对会计信息乃至会计系统的影响, 以及会计信息对人类行为和行为决策的影响。行为会计学源于美国。自从 Birnberg 和 Shields(1989) 对行为会计学进行最初综述之后,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行为会计学在广度、深度和复杂性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在指导理论方面,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出现的许多行为决策理论和心理认知研究仍然持续地影响着今天的行为会计学研究。出于篇幅的限制, 本文的目的在于简要综述行为会计学在个体研究方面的研究框架, 以有利于研究人员整合各类行为会计学中的个体研究。

## 2 行为会计学研究简介

今天的行为会计学已经超出了实验室实验、问卷调查或者实地研究等传统的行为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等之前在行为学领域并不流行的研究方法如今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行为会计学的研究当中, 例如 Banker 等人 (2000)<sup>[2]</sup> 和 Ittner (2007)<sup>[3]</sup>。因此传统的行为会计学跟会计资本市场研究 (Capital Market Research) 的界线越来越模糊, 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样化。各类文献综述

也对行为会计学的众多方面, 例如研究主题 (审计、管理会计、资本市场等) 或研究方法 (实验法、实地研究等) 进行了综述。然而, 对于行为会计的框架方面的综述却不是很多。在行为会计学的框架方面, 从研究对象来划分, 可以分为个体研究、小组研究、组织层面研究及大环境研究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的研究就像四个同心圆, 每一层的圆圈的研究内容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中间的小圆圈。其中个体研究在最中心, 其研究对象有很显著的具体性, 学术界对个体的研究也是最丰富的。而最外面的圈则是大环境研究, 其研究对象最抽象, 变量最多, 研究成果也不易取得外部有效性。

Birnberg(2011)<sup>[1]</sup> 对这四个研究层面进行了定义。行为会计学中个体研究的研究重点在于单个行动者的特性及该行动者对于某些会计数据、会计有关的刺激变量或会计有关的环境的反应。小组层面的研究着重于研究由少数个体组合成的小组的行为。通常这类小组的成员具有利益和目标的一致性。组织层面 (部门层面) 的研究重点是公司的政策法规、公司的特性或者组织文化对公司 (或部门) 会计政策的影响。大环境层面的研究重点在于研究会计在社会中的角色: 国家、地域或事件的特性对于会计政策的影响, 或者会计政策如何影响社会。例如美国的 Sarbanes-Oxley Act 的出台对于社会的影响一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2.1 个体研究定义和其中具体分类的论述** 如前所述,行为会计学中个体研究也被称为个体选择研究(individual choice studies),其研究重点在于单个行动者的特性及该行动者对于某些会计数据、会计有关的刺激变量或会计有关的环境的反应。Shields(2007)<sup>[4]</sup>的文章表明,在2004年到2007年的会计行为研究期刊中发表的文章有90%把研究对象放在个体层面。

在个体研究中有两类主流方向,一类研究将重点放在个体行动者如何解决问题(problem solving)方面。这类研究的重点在于行动者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不对他人的行为进行研究。另外一类研究方向的重点在于明确地考虑策略行为对行动者的影响(strategic studies),因此行动者必须把他人的行为考虑进去,研究的场景也会有意识地把他人行为变量放入。

**2.2 个体研究中的研究方法** Shields(2007)<sup>[4]</sup>指出,在个体研究的研究方法中,绝大部分还是属于实验型研究,少部分为问卷调查。当决策环境中决策者和决策变量已经众所周知时,实验型研究就是一种很有效的研究方法,例如投资决策(Libby和Tan,1999<sup>[5]</sup>)、公平性(Evans等,2005<sup>[6]</sup>)、薪酬激励制度(Sawers等,2011<sup>[7]</sup>)、或道德方面(Kaplan等,2010<sup>[8]</sup>)等问题的研究。

近些年来,学者在对行为会计学的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采用了档案式研究。在这类研究中,学者通常能够收集到社会重大事件(刺激物)发生之前和之后的行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这类研究通常在各类法规出台后进行法规效果的研究,例如美国的萨班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的出台对于企业会计行为的影响、中国新会计制度的出台对于国内企业会计行为的改变、税法的出台对于行业的改变等等。

**2.3 个体研究中研究对象的构成** 早期的行为会计学研究中大量地运用了学生,这点在北美的各大会计学术期刊中都有很多具体的例子。这些学生以MBA学生或者本科的商科学生为主。显而易见,由学生构成的研究对象将使研究结果的外在效度明显降低。其原因主要是学生的社会经验和实践经验与实际企业中的从业人员相差较大。

近20年来,行为会计学研究重点的转变使得用学生作为研究和实验的对象的不再适

应研究的需要。不少人认为,学生首先不具备从业者所有的职业操作知识和经验,而且实验室的实验也不能很好地复制实际操作当中的复杂性。因此,运用业界人员是研究的一个很明显的发展趋势。但对于实验室里的实验是否具备外在效度,Fehr和Leibbrandt(2008)<sup>[9]</sup>对实验室复制现实工作环境的研究进行了论证。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对象在实验设置的行为很好地预测了实际工作环境的为。

对于从业人员的选择也越来越趋于专业化。例如在研究会计制度的可能性改变对从业人员的行为影响中,实验对象就需要具备相当的会计方面的专业知识才能使实验结论具备可靠的外在效度。还有对于投资管理方面的研究中,实验对象必须具备一定的会计专业知识来对各类投资选择进行反映(例如:Libby和Tan,1999<sup>[5]</sup>)。但不少以金融市场为方向的会计研究中,例如Tan和Tan(2009)<sup>[10]</sup>,研究人员还是会较多地运用MBA的学生来代替质朴的投资人(naive investor,具备一定金融知识但不从事金融投资工作)。

性别产生的差异也是研究对象选择方面的问题之一。从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出发,样本的个体差异可以用随机抽取的方式来克服。然而,许多研究还是对基于性别的差异的行为差异进行了研究。而且,如果性别所决定的行为有明显差异,则随机抽样的办法将忽略潜在的自变量。比较显著的例如在冒险性方面(例如:Jacobsen等,2007<sup>[11]</sup>;Huang和Kisgen,2008<sup>[12]</sup>)、竞争(例如:Gupta等,2005<sup>[13]</sup>)或者谈判(例如:Bowles等,2007<sup>[14]</sup>)。在研究性别问题方面,有一类研究把重点放在专业培训和经验能否消除性别带来的行为差异。Chin和Chi(2008)<sup>[15]</sup>以及Beckmann和Menkhoff(2008)<sup>[16]</sup>都认为性别带来的行为差异不易被消除:女性更加趋向风险规避及避免竞争。

### 3 影响个人行为的非经济因素

在行为会计学研究中,有一类研究是以传统经济学模型中关于个体行为的假设为主要理论依据。假设认为,自利(self-interest)是主要的行为指导因素之一;而运用结果的货币化是唯一可信的衡量方法。

然而,众多研究表明,个体的行为并非以自利

为主要的行为指导,而是遵从一些社会准则,诸如公平(fairness)(例如:Rabin, 1993<sup>[17]</sup>; Fehr 和 Schmidt, 1999<sup>[18]</sup>, Evans 等, 2005<sup>[6]</sup>)、诚实(honesty)(例如:Evans 等, 2001<sup>[19]</sup>)、合作愿意(willingness to cooperation)(例如:(Fehr 和 Gaechter, 2000<sup>[20]</sup>; Fehr 和 Leibbrandt, 2008<sup>[9]</sup>)等(更多在: Camerer, 2001<sup>[21]</sup>; Moser, 1998<sup>[22]</sup>)。这些研究表明,个体很容易就作出非自利行为。并且,这些研究也阐述了个体对于平等的感觉及他们在失去平等时的行为表现。平等的表现不单在于待遇和回报的平等,还有信息是否对称方面。而且,哪些行为会促使交易双方认为对方值得(或不值得)相信;哪些因素让审计师更加信任某位顾客(反之亦然);哪些因素让管理者更加信任下属等问题都属于影响个人行为的非经济因素的范畴。

**3.1 文化的影响** 在研究社会标准和跨文化的价值差异对个体的影响中,行为会计学研究主要侧重于这些差异会否影响个体的决策和行为。在社会标准和价值方面的研究很大部分都是以 Hofstede(1980)<sup>[23]</sup>的框架为基础的。基于该理论框架,在社会标准和文化差异方面的研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比较亚洲和北美的劳动力市场(例如: Birnberg 和 Snodgrass, 1988<sup>[24]</sup>; Chow 等, 1999<sup>[25]</sup>)。然而,在运用 Hofstede 的框架作为基础的研究中,结论却并非统一。一部分学者发现社会标准和文化的差异的确能有效地预测个体的行为和决策(例如: Kachelmeier 和 Shehata, 1997<sup>[26]</sup>),另一些学者却得出无效的研究结果(Birnberg 等, 2008<sup>[27]</sup>)。因此,此后的一些研究也表明在运用 Hofstede 的框架时必须考虑其框架的适用范围(例如: Baskerville, 2003<sup>[28]</sup>)。

当管理系统和方式逐渐国际化和统一化的时候,跨文化的差异就成为研究的热点了。然而,运用 Hofstede 的理论框架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小经济体的差异。在这一方面, Henrich 和他领导的 Cross-cultural Ultimatum Game Research Group 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在 Henrich 等(2005)<sup>[29]</sup>和 Henrich 等(2001)<sup>[30]</sup>的研究文章中都提到了以教科书上的经济模式作为社会标准和文化差异不能很好的预测个体的决策和行为。Henrich 等认为,市场一体化的程度越高,社会对于合作的回报越大,在实验游戏中的合作水平越高。

社会标准和文化方面的研究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量表的开发。特别是文化方面的开发一直是热点,因为跨文化的差异程度不易直接观测并直接度量。

**3.2 伦理道德的影响** 行为会计学中道德的研究与社会标准和文化方面的研究有比较紧密的关联。在社会标注和文化方面的研究常常把重点放在研究他人期望行动者的行为的背景上,而道德的研究通常把重点放在行动者的行为上(不把他人的期望作为主要变量)。早期的道德行为研究把研究重点放在参与者的道德发展上(例如: Ponemon, 1990<sup>[31]</sup>)。这类研究大多把重点放在两个方面:其一,研究被关注的个体或者群体的道德发展程度;其二,研究在某种程度的道德发展对职业行为的影响。

Fleischman 等(2007)<sup>[32]</sup>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道德研究的例子。这篇文章以案例分析的形式研究了管理者对包含报税背景下(美国税法中的“无辜配偶条例”)配偶道德行为的信息的案例进行评估。这篇文章揭示了在“无辜配偶条例”适用的情况下,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个人的道德行为及解释力度。该研究方法可以启发例如在对公平性的预期条件下,个体的工作行为的预测的研究。Rose(2007)<sup>[33]</sup>把管理层的财务报表中的信息道德标记与投资人的信任程度联系起来进行了分析。这也为道德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类研究方法:不对自己的道德水准进行衡量以减少倾向性偏差。

此外,把个人的道德行为与周围环境联系起来也是一个研究的发展方向。例如 Booth 和 Schulz(2004)<sup>[34]</sup>用实验的方式研究了组织的伦理氛围(organization's ethical climate)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当个体的道德水平一致的时候,个体的行为与组织的伦理氛围方向一致。不少学者也把跨文化研究和道德研究结合起来。研究表明,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下,审计人员的道德标准是有差异的(例如: Patel 等, 2003<sup>[35]</sup>; Arnold 等, 2007<sup>[36]</sup>)。Spicer 等(2004)<sup>[37]</sup>及 Bailey 和 Spicer(2007)<sup>[38]</sup>对美国籍驻俄罗斯工作人员的系列研究中发现,尽管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美国籍的工作人员也显示出与俄罗斯当地一致的道德倾向和行为,即使这类道德行为违反了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道德标准。

内疚感也能对行动者的行为造成影响。Schnedler 和 Vadovic(2007)<sup>[39]</sup>的研究发现,为了避免内疚,受测者会倾注比控制系统最低要求更多的功夫。Staffiero(2007)<sup>[40]</sup>对日本公司的工作小组进行研究发现,小组成员在觉得自己没有对组织作出足够贡献时会感到内疚。

与社会标准和文化方面的研究一样,道德方面的研究的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就是怎样衡量个体的道德水平。因为也像文化差异一样,道德的发展水平(相对于行动来说)不易直接观测到。因此,如何减少干扰因素以获得更多的有效数据是道德研究的一个重点。通常研究人员会运用调查问卷或案例实验来获得数据,而调查问卷中的倾向性偏差也容易造成量表数据的有效性降低。

**3.3 情绪的影响** 近年来,研究人员开始对决策者的情感状态对决策过程的影响进行研究。情绪研究的基础研究原理是情绪影响对之前经验的看法和态度,积极的情绪状态导致在相同的经验下检索到积极结果,反之亦然。例如 Wright 和 Bower(1992)<sup>[41]</sup>的研究表明,对主观概率的估计是受决策者的情绪所影响。“快乐”的决策者(相对于“悲伤”的决策者)对成功事件发生概率的估算更高,负面事件的发生概率估算更低。Cheung 等(2008)<sup>[42]</sup>在对审计人员的盘存行为进行研究时发现,当审计人员在良好情绪的时候盘存结果则更激进。Moreno 和 Bhattacharjee(2008)<sup>[43]</sup>在研究谈判行为中发现当获知对方的情绪状态后,决策者的行为与未知道对方情绪状态时相比有比较显著的区别。Lerner 和 Keltner(2000<sup>[44]</sup>, 2001<sup>[45]</sup>)对受测者的担心情绪和生气情绪及风险测评行为进行的系列研究发现,具有担心情绪的受测者在评估风险等级时显得更加消极,并且他们也更倾向于规避风险。与此同时,在生气情绪下的受测者对风险测评进行评估时更趋于乐观,并且更乐于趋向风险。

上述在情绪对行为的影响的研究当中可以归纳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情绪是否让人们的行为过于乐观或者过于悲观。然而,要解决判断行为是否过于乐观或者过于悲观的问题,就需要一个标准点:在没有情绪倾向的时候的评估值。从逻辑角度来说,两种情绪中至少有一种情绪会使评估偏离正确值,但是否两种情绪都会把决策者的评估值带离正常值却难以衡量。因为决策者的

错误很可能是由于其他因素,诸如能力、信息完整度,而不是由于情绪造成的。因此在有“已知正确答案”的情况下进行试验设计将会更加理想。另外,在实际操作中,Gilbert 等(2004)<sup>[46]</sup>运用了“后悔”作为指标来替代“已知正确答案”是另一个值得尝试的研究方法。

## 4 结论

行为会计学的研究人员已尝试了各种方法来理解决定流程。虽然自 Birnberg 和 Shields(1989)<sup>[47]</sup>用于研究个人行为的方法没有明显改变,行为会计学中的研究还是与实验经济学的趋势相一致。行为会计学的很大一部分研究主要关注决策者在与自身利益和利益最大化假设的影响因素不一致的决策行为。这些非经济因素包括信任行为、合作和对公平奖励的预期。在一些情况下,这些非经济因素也可能使决策者获得更大的收益。然而,这些因素也可以让决策者面临更大的经济风险。其他“工作环境”特征的差异,例如国家或地方文化,也会影响个体决策者的行为和期望。某些文化中观察到的个体差异可能是由于不同国家间的市场条件造成的。

对个体行为的研究和理解往往是研究理解小组和团体行为的关键前提。对于个体的研究如果从大环境中孤立出来就容易造成研究成果的差错。正如前面讨论过的,环境对个体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并且,在不同的环境下,相同的个体所作出的行为决定也会有许多不同。例如 Evan 等(2001)<sup>[19]</sup>和 Cohen 等(2008)<sup>[48]</sup>所展示的,当个体没有与其他个体进行相互影响时,对个体在组织中的行为预测将违背传统经济学理论。因此在实验设计中要加以注意。

## 5 参考文献

- [1] Brinberg J. A proposed framework for behavioral accounting research [J]. *Behavior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 2011, 23(1)
- [2] Banker R, Potter G, Srinivasan D.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an incentive plan that includes nonfinancial measure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0, 75 1:65
- [3] Ittner C. Archival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accounting [R]. Presented at Doctoral Consortium at Management Accounting Section Mid-Year Meeting, 2007

- [4] Shields M. Presentation at the editors panel [R]. ABO Annual Research Conference, Philadelphia, PA, 2007
- [5] Libby R, H Tan. Analysts' reaction to negative earnings surprise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9, 37(2):413
- [6] Evans J, D Moser, C Kim. Economic and equity effects on reporting decision [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005, 30(7/8):609
- [7] Sawers K, A Wright, V Zamora. Does greater risk-bearing in stock option compensation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problem framing on managerial risk-taking behavior? [J]. *Behavior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 2011, 23(1):185
- [8] Kaplan S, K Pope, J Samuels. The effect of social confrontation on individuals' intentions to internally report fraud [J]. *Behavior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 2010, 22(2):51
- [9] Fehr E, Leibbrandt. Cooperativeness and impatience 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R]. IZA Discussion Paper 3625; 2008
- [10] Tan H, S Tan. Investors' reactions to management disclosure corrections: does presentation format matter?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9, 26(2):605
- [11] Jacobsen B, J Lee, W Marquering. Are men more optimistic? [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2008) Publisher: SSRN; Available at: <http://ssrn.com/abstract=1030478>
- [12] Huang J, D Kisgen. Gender and corporate finance [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2009) Publisher: SSRN, Pages: 1-56
- [13] Gupta N, A Poulsen, M Villeval. Male and female competitive behavior: experimental evidence [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2005) Publisher: SSRN; Available at: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851227](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851227)
- [14] Bowles H, L Babcock, L Lai. Social incentives for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propensity to initiate negotiations: sometimes it does hurt to ask [J].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07, 103(1):84
- [15] Chin C L, H Y Chi. Gender differences in audit quality [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2008) Publisher: SSRN; Available at: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149405](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149405)
- [16] Beckmann D, L Menkhoff. Will women be women? Analyzing the gender differences among financial experts [J]. *Kyklos* 2008, 61(3):364
- [17] Rabin M. Incorporating fairness into game theory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 83: 1281
- [18] Fehr E, K Schmidt. 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114: 817
- [19] Evans J, R Hannan, R Krishnan, et al. Honesty in managerial reporting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1, 76(3):537
- [20] Fehr E, S Gaechter. Cooperation and punishment in public goods experiment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90(4):845
- [21] Camerer C. *Behavioral Economics*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2] Moser D. Using an experimental economics approach in accounting research [J]. *Behavior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 1998, 10 Supplement: 94-110
- [23]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attitudes* [M]. Beverly Hills, CA: Russell Sage, 1980
- [24] Brinberg J, C Snodgrass. Culture and control: a field study [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1988, 13(5):447
- [25] Chow C, M Shields, A Wu. The importance of national culture in the design of and preference for management controls for multinational operations [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1999, 16(1):47
- [26] Kachelmeier S, M Shehata. Internal auditing and voluntary cooperation in firms: a cross-cultural experiment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7, 72(3):407
- [27] Birnberg J, V Hoffman, S Yuen. The accountability demand for information in China and the U. S.-A research note [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008, 33(1):20
- [28] Baskerville W. Hofstede never studied culture [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003, 28(1):1
- [29] Henrich J, R Boyd, S Bowles, et al. "Economic man"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 [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05, 28:795
- [30] Henrich J, R Boyd, S Bowles, et al. In search of homo-economicus: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2):73
- [31] Ponemon L. Ethical judgments in accounting: a cognitive-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J].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 1990, 1:191
- [32] Fleischman G, S Valentine, D Finn. Ethical reasoning and equitable relief [J]. *Behavior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 2007, 19: 107
- [33] Rose J. Attention to evidence of aggressive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intentional misstatement

- judgments: effects of experience and trust [J]. *Behavior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 2007, 19:215
- [34] Booth P, A Schulz. The impact of an ethical environment on managers' project evaluation judgments under agency problem conditions [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004, 29 (7/8):473
- [35] Patel C, G Harrison, J McKinnon. Cultural influences on judgments of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in auditor-client conflict resolu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 Accounting*, 2003, 13(1):1
- [36] Arnold D, R Bernardi, P Neidermeyer, et al. The effect of country and culture on perceptions of appropriate ethical actions prescribed by codes of conduct: a Western European perspective among accountant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7, 70(4):327
- [37] Spicer A, T Dunfee, W Bailey. Does national context matter in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An empirical test of integrative social contracts theory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4, 47 (4):610
- [38] Bailey W, A Spicer. When does national identity matter?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thic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50(6):1462
- [39] Schnedler W, R Vadovic. Legitimacy of control [J].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2011, 20(4):985
- [40] Staffiero G. Peer Pressure and Inequity Aversion in the Japanese Firm [C]. IESE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No. 645, 2007,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959391>
- [41] Wright W, G Bower. Mood effects on subjective probability assessment [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2, 52 (2):276
- [42] Chung J, J Cohen, G Monroe. The effect of moods on auditors' inventory valuation [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08, 27(2):137
- [43] Moreno K, S Bhattacharjee. The interplay of an opponent's emotions and the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 during transfer price negotiation [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Accounting,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s Section Conference, October 2008;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1156860>
- [44] Lerner J, D Keltner. Beyond valence: towards a model of emotion-specific influences on judgment [J]. *Cognition and Emotion*, 2000,14(4):473
- [45] Lerner J, D Keltner. Fear, anger, and risk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1, 81(1):146
- [46] Gilbert D, C Morewedge, J Risen, et al. Looking forward to looking backward: the misprediction of regret[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4, 15(5):346
- [47] Birnberg J, J Shields. Thirty years of behavioral research [J]. *Behavior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 1989, 1:23
- [48] Cohen J, L Gaynor, G Krishnamoorthy, et al. Academic research on communication among external auditors, the audit committee and the board: implic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practice [J]. *Current Issues in Auditing*, 2008, 2 (1):A1

## NON-ECONOMIC FACTORS IN INDIVIDUAL LEVEL RESEARCH OF BEHAVIORAL ACCOUNTING

SUN Yu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of Facult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hai, 519085, Zhuhai,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Behavioral Accounting Research is an edge discipline overlapping the accounting and social science. It mainly focuses on human activities interacting effect with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accounting system. Today, the behavioral decision-making theories and cognitive psychology literatures up to the late 1980s continue to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Behavioral Accounting Research. The current paper conducted a brief literature review on non-economic factors of the individual level research in Behavioral Accounting Research in hope to provide a clear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 in such area.

**Key words** Behavioral Accounting Research; individual level research; non-economic factors

# 管理滥用对员工组织报复行为的影响机制

高艳<sup>1</sup> 闫巩固<sup>2</sup>

(1)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教育学院,519085,广东,珠海;2)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100875,北京)

**摘要**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管理滥用行为对员工报复行为有何影响?此项研究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我们运用“管理滥用问卷”和“组织报复行为问卷”对263名在职人员做了调查,尝试从管理者的行为探讨员工行为发生的模式和机制,将组织公平感作为中介变量,验证员工对管理滥用行为的知觉程度对报复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并从员工自身的情绪特征探讨管理滥用和组织公平感对员工报复行为的影响。经过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发现:(1)管理滥用对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员工知觉到的滥用行为越多,感受到的不公平感越强。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对报复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2)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部分中介了管理滥用对报复行为的作用。分配公平与报复行为的相关不显著,所以没有起到中介作用。(3)负性情感在管理滥用和员工组织报复行为的关系中起到调节的作用,也就是在负性情感强烈的个体中间,管理滥用和员工组织报复行为之间的关系更强。

**关键词** 管理滥用;员工报复行为;组织公平感

## 1 引言

领导行为的研究是组织研究领域比较重要的话题。一直以来,大量的研究关注比较多的是正向的领导行为,例如变革型领导、魅力型领导等,并且人们认为正向的领导行为会带来正向的员工行为,例如组织公民行为、员工敬业行为<sup>[1-2]</sup>,从而带来更高的组织绩效。

近十几年来人们开始关注领导行为中的“阴暗面”,比如性骚扰、办公室冷暴力等,并且可以预测的是这些负面的领导行为会引起员工的负面行为,从而给组织绩效带来负面的影响<sup>[3-4]</sup>。管理滥用(Abusive Supervision)就是负面领导行为中一个典型的概念,是近几年逐渐兴起的一个议题。管理滥用概念的提出者Tepper将其定义为被下属主观知觉到管理者表现出来的敌意,这种敌意具有持续性,并且体现在言语和非言语行为上,但不包括肢体接触(Physical contact),例如公开批评、发脾气、侵犯员工隐私、不信守承诺、迁怒于员工、嘲笑和撒谎等<sup>[5]</sup>。

在员工的偏差行为当中,研究比较多的是组织报复行为(Organizational Retaliatory Behavior)。组织报复行为则被认为是一种与组织公民行为性质相反的行为,是阻碍组织功能正

常发挥的消极行为。Skarlicki和Folger将其描述为“旨在对组织不公平事件做出的回击”,可能的行为包括有意破坏生产设备,浪费公司财物,谎称病假以及不听上司指示等<sup>[6]</sup>。此类的负性行为,会对组织效率产生很大危害。国内学者对管理滥用和组织报复行为的概念已经进行了介绍<sup>[3,7]</sup>,但是这个方面的实证研究还相对很少。可以预见,相比美国而言,在中国这样高权力距离的文化氛围中,研究管理滥用对员工负面行为的影响显得更加有意义。Tepper本人也认为在高权力距离的文化氛围中,管理滥用对员工行为的影响可能是不同,建议今后的研究可以在多个文化氛围进行有意义的探索<sup>[8]</sup>。

Tepper本人以及其他研究者开展的诸多研究证明,管理者的这些行为不仅给员工带来工作-家庭冲突、工作/生活不满以及心理上的压力,还造成了员工的最终离职<sup>[5]</sup>。Tepper曾经先后两次邀请同一批被试参加调查,到第二次时,其中有一部分人已经辞去原先的工作。另一方面,知觉到这种管理滥用行为的员工会在工作中采取一些偏差行为来取得心理上的平衡,这些偏差行为包括消极怠工、推卸责任、偷窃等<sup>[8-9]</sup>。这些组织报复行为正是员工感到不满时所采取的“反击”。总之,研究证明,管理滥用会导致员工的组织报复

行为。

关于员工组织报复行为的诸多研究已经指出,报复行为往往会随着员工的不公平感的增加而加剧<sup>[6-7]</sup>。从组织公平感的意义上来看,不公平感的产生必然是某人或某权威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利益、愿望或心理上的满足感凌驾于其他人之上,而导致他人资源的损失和心理失衡状况的产生。

根据公平理论,可将人们在组织内知觉到的公平感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sup>[10]</sup>。其中互动公平是指个体感觉到在与组织的代言人或者代表交流的过程中是否被尊重、被诚实和适当对待。而管理滥用正是员工知觉到的来自管理者的有针对性的敌意,包括公开批评、嘲笑等。长期处在管理者不当对待的环境中,员工会认为组织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约束这种不当行为,以保护他们的利益,公司的管理程序上是有问题的。而且,如果感觉到上司花了很多时间来故意指责自己,员工会推断这种敌意会影响到自己的收入,会让自己的收入比应得的收入更少或者比同辈的人更少,这些会使他们产生分配不公平的知觉<sup>[5]</sup>。由此可以推断管理滥用必然影响员工的组织公平感。

Tepper 还提出,同样遭遇上司的管理滥用行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这里个体的特征,比如人格特征或者情绪特征等可能会起到调节的作用。有研究证明,管理滥用带来针对员工的偏差行为受到负面互惠信念的调节,也就是同样的管理滥用程度,带有负面互惠信念的人会采取更多的报复行为<sup>[11]</sup>。Skarlicki 和 Folger 的研究也发现,人格在公平感和报复行为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sup>[12]</sup>。

工作场所中,员工的报复行为的发生总是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生气、愤怒等负面情绪。而情绪又分为两种基本模式,负性情感(Negative Affectivity, NA)和正性情感(Positive Affectivity, PA)。高 PA 的个体往往有较强的幸福感,认为自己是积极的,自我效能感高,也愿意参加各种活动。高 NA 的人对自己和周围的一切都容易产生消极的态度。

Skarlicki 和 Folger 等人的研究显示,负性情感(Negative affectivity, NA)对报复行为有显著预测作用,并且在组织公平感和报复行为之间具

有调节作用。在有高负性情感的人那里,分配公平和互动公平的交互作用对报复行为有显著预测效果。当负性情感很高,而分配和互动公平很低时,报复行为发生的频率最高<sup>[6,12]</sup>。

基于前人的以上研究,本研究分析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管理滥用和员工组织报复行为之间的关系,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管理滥用带来员工的组织报复行为。

假设 2:不公平感在管理滥用和组织报复行为中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 3:负性情感在管理滥用和组织报复行为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

变量之间的关系框架如图所示:



图 1 研究框架图

##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参与被试有 263 人,回收有效问卷 240 份,占总人数的 91%。所有被试均来自某高校的在职教育班学员。女性居多,占总人数的 73%,男性占 27%。年龄结构上 25 岁以下的占 52%,26 岁到 30 岁的有 36%,35 岁以上的只有 3%;教育程度以大专居多,占到 50%,其次为本科学历,占 32%。被试从事的工作岗位类型多样,职能类和客服类稍居多,分别占总数的 27%和 16%;在是否担任管理职责的回答上,23%回答“是”,75%回答“否”。

调查研究采用集体发放和回收问卷的方式。为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特别强调问卷的匿名性,如果被试有多家单位的工作经历,就按照在上一家单位的经历填写。为避免从单一被试取得信息易出现的共同方法偏差,问卷尽可能使用清晰准确的语言和适当的反向用语等。

### 2.2 研究工具

**2.2.1 管理滥用问卷** 对管理滥用的测量采用 Tepper(2000)的问卷,由员工自我评价,5 点评分,共 15 道题。问卷在本研究中的信度分析 Alpha 系数为 0.79。

**2.2.2 组织公平感问卷** 对组织公平感的测量本研究采用 Coquitt(2001)的四因素问卷,5 点评

分,该问卷共有 20 个题目。问卷在本研究中的信度分析 Alpha 系数为 0.92。运用 Lisrel 8.7 验证组织公平感的四因素模型,分析各项指标分别是: $\chi^2 = 502.63$ ,  $df = 203$ ,  $\chi^2/df = 2.47$ ,  $RMSEA = 0.08$ ,  $SRMR = 0.058$ ,  $GFI = 0.84$ ,  $AGFI = 0.76$ ,  $CFI = 0.96$ ,  $NNFI = 0.96$ ,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但进一步的相关分析显示,人际公平和信息公平的相关程度达到 0.93,因此,我们将信息公平和人际公平合并为互动公平,新模型的各项指标是: $\chi^2 = 491.72$ ,  $df = 186$ ,  $df/\chi^2 = 2.64$ ,  $RMSEA = 0.087$ ,  $SRMR = 0.059$ ,  $GFI = 0.83$ ,  $AGFI = 0.79$ ,  $CFI = 0.96$ ,  $NNFI = 0.95$ 。从模型最简化的原则出发,我们最终接受该三因素模型。这一结果和钟建财(2006)、张惠晨(2005)等的研究结果一致。以下分析组织公平各个维度与变量间的关系时,也将采用此三因素结构。

**2.2.3 组织报复行为问卷** 对组织报复行为的测量采用 Skarlicki 和 Folger(1997)编制的报复行为问卷,5 点评分,共有 15 道题。问卷在本研究中的信度分析 Alpha 系数为 0.79。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N=240)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1. 程序公平	3.78	1.05					
2. 分配公平	3.30	1.35	0.50**				
3. 互动公平	3.99	0.96	0.69**	0.52**			
4. 管理滥用	1.77	0.59	-0.30**	-0.14*	-0.45**		
5. 报复行为	1.80	0.49	-0.21**	-0.04	-0.25**	0.37**	
6. 负性情感	2.61	0.93	-0.05	-0.18**	-0.14*	0.27**	0.23**

**3.2 组织公平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按照温忠麟等介绍的中介效应检验的程序,依次对各条路径进行验证<sup>[13]</sup>。

由表 2 可以看出,管理滥用对员工报复行为的作用显著,假设 1 得到验证。管理滥用显著影响员工的程序公平、互动公平。因为管理滥用对分配公平的直接效应不显著,因此对分配公平的中介效应检验停止。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对报复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分配公平的作用不显著。当把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纳入到管理滥用对报复行为的方程中时,二者的作用依旧显著,并且管理滥用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就此认为,组织公平感部分中介了管理滥用对报复行为的影响。员工对管理者在人际互动中的不当对待的感受,影响员工对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的判断,进而影响报复

**2.2.4 负性情感问卷** 对负性情感的测量采用 Waston 发展的简式正性和负性情感核检表(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PANAS)中负性情感问卷部分,一共 10 个项目,负性情感问卷在本研究中的信度分析 Alpha 系数为 0.85。

研究采用 SPSS 15.0 统计软件包和 Lisrel 18.7 进行数据分析。

### 3 结果分析

**3.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出,(1)组织公平内部各个结构存在中等程度相关。(2)管理滥用和组织报复行为呈现显著的正相关。(3)管理滥用与公平感三个维度均有显著负相关,即员工知觉到的主管的敌意程度越高,他们在工作环境中感受到公平感越低,反之亦然。(4)总体上公平感的三个方面都与报复行为呈现负相关。其中分配公平与组织报复行为的相关较低。这些为进一步的假设验证提供了基础。

行为的发生频率,假设 2 得到部分验证。

**3.3 负性情感的调节作用检验** 在这个部分的分析中,我们把员工自身的情绪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探索其他自变量对员工报复行为的关系。为了更加明了情绪在管理滥用、组织公平对员工正负性行为的作用,按照假设,我们逐一进行调节作用检验。首先,将负性情感总均分按照百分位数 3 等分,33% 以下为低分组,66% 以上为高分组,通过比较高低组回归系数的差异判断调节效应。

由表 3 可以看出,管理滥用和互动公平在高负性情感时的回归系数显著,而在低负性情感上不显著,证明了负性情感的调节作用显著。对于程序公平,高低情感组的回归系数均是显著的,只是在影响程度上略有差异。而不管是低负性情感组还是高负性情感组,分配公平对报复行为的预

测作用都是不显著的。假设 3 得到部分验证。

表 2 公平感的中介效用检验

	因变量	自变量	回归系数	T 值	显著水平	R <sup>2</sup>
控制变量	报复行为	性别	-0.121	-1.37	0.172	
		年龄	-0.046	-0.817	0.415	
		教育水平	0.028	0.494	0.622	
		公司规模	-0.005	-0.173	0.863	
		公司性质	0.014	0.566	0.572	
		工作时间	0.007	0.293	0.770	
		工作岗位	0.007	0.454	0.650	
		负性情感	0.149	3.495	0.001	0.075**
直接效应 X→Y	报复行为	管理滥用	0.346	5.518	0.000	0.115**
X→M	程序公平	管理滥用	-0.589	-5.086	0.000	0.102** <sup>b</sup>
		分配公平	-0.230	-1.448	0.149	0.009
		互动公平	-0.751	-7.432	0.000	0.196**
M→Y	报复行为	程序公平	-0.155	-4.405	0.000	0.075**
		互动公平	-0.178	-4.685	0.000	0.084**
X, M→Y	报复行为	程序公平	-0.101	-2.800	0.006	
		管理滥用	0.286	4.380	0.000	0.143**
		互动公平	-0.104	-2.478	0.014	
		管理滥用	0.268	3.857	0.000	0.137**

表 3 负性情感的调节作用检验

系数	管理滥用		程序公平		分配公平		互动公平					
	T 值	p 值	系数	T 值	p 值	系数	T 值	p 值				
低负性情感 (N=81)	0.157	1.676	0.098	-0.097	-2.269	0.026	-0.027	-0.800	0.426	-0.087	-1.765	0.082
高负性情感 (N=76)	0.266	2.783	0.007	-0.156	-2.438	0.017	-0.041	-0.811	0.420	-0.141	-2.230	0.029

## 4 讨论

本研究尝试从管理者的行为探讨员工行为发生的模式和机制,将组织公平感作为中介变量,验证员工对管理滥用行为的知觉程度对报复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并从员工自身的情绪特征探讨管理滥用和组织公平感对员工报复行为的影响。结果分析验证了大部分假设,我们接下来将逐一进行讨论。

**4.1 公平感的结构** 对于组织公平的结构,研究结果显示人际公平和信息公平呈现高相关,因此分析时采用了合并后的互动公平维度。对于公平维度划分的争论一直是组织公平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各个维度之间不同程度的相关使得这一结构变得复杂而不确定。因此, Cropanzano 和

Ambrose 在讨论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的区别时,提出“一元论”的观点,认为人们不可能总是意识到二者的差异,多数情况下公平被知觉为一个整体<sup>[14]</sup>。本研究中出现的人际公平和信息公平的高相关也存在知觉上无法区分的可能性。因为,二者与主管的态度和行为联系紧密,它作为一个共变量影响员工在人际和信息方面的公平判断。在“关系”文化氛围的组织当中,人们对团队地位的需求强烈,因此在知觉与管理者有关的信息出现时,倾向于用一元的认知方法。公平的启发式理论也认为,对于与管理者不确定的关系,员工一旦形成公平或不公平的判断,就以固定的模式处理和管理者的关系以及加工相应的信息,而停止寻找新的证据。

**4.2 公平感的中介效应** 管理滥用是本研究假

设的组织公平感的前因变量,分析结果发现,它对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的预测作用显著,员工知觉到的滥用行为越多,不公平感越强。这是因为一些滥用行为本身违反了公平的原则,比如“对我粗鲁和无礼”违反了人际公平的尊重标准。并且员工将管理者的行为知觉为敌意的过程损害了他对管理者的信任,并有可能推而广之到所有与管理者有关的行为和关系上,包括程序公平。

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对员工报复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分配公平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当纳入管理滥用时,组织公平的作用发生变化,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部分中介了管理滥用对报复行为的直接效应。同样,分配公平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这种结果与 Kennedy 的研究结果类似。他在研究中明确指出分配公平与报复行为的相关程度低于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与报复行为的相关<sup>[15]</sup>。Skirlicki 和 Folger(1997)的研究却发现,组织报复行为(ORBs)与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相关程度相等,而互动公平对它的独特效应最强<sup>[6]</sup>。也有研究指出,仅有分配公平还不能够触发攻击性行为。可能的解释是,因为不利结果而感受到不公平感以后,个体还需要一个更强的动机或理由<sup>[16]</sup>。

Tepper 把组织公平作为调节变量,认为组织公平调节管理滥用和工作满意度、工作—生活冲突等的关系<sup>[5]</sup>。本研究的相关分析发现,组织公平感三个维度和管理滥用均达到显著负相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与报复行为之间也呈显著负相关,而理想的调节模型是调节变量与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都不大<sup>[13]</sup>,因此,我们认为中介模型比调节模型更加符合管理滥用对报复行为的作用机制。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发现<sup>[17]</sup>。

管理滥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组织公平感的前因变量,同时,与公平判断的这种动态的可变的特性相比,管理滥用对员工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更加直接和强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分析中发现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的中介作用是部分的,而不是完全的。明确这一机制同样对组织实践有重要意义。

**4.3 负性情感的调节作用** 情绪作为员工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组织研究中不可忽视。研究显示,负性情感与报复行为显著正相关。调节效应分析发现,高负性情感出现时,管理滥用和互动

公平对报复行为的影响显著大于低负性情感。这对组织工作实践也有较大的启发意义。组织中对消极情绪的处理往往采取压制、隔离、规定等方式,按照精神动力学的观点,情绪是不会被消减掉的,压制反而会以一种破坏性的形式爆发。因此,疏导消极情绪,有效引导积极情绪对组织管理来说非常有必要。

本研究对管理实践的启示是,虽然在组织中报复行为的发生频率比较低,但作为一种相对隐蔽的行为方式,还是具有破坏性。管理者要善于发现员工的异常行为,了解行为背后的原因,并注意自己的言行对员工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特别是在不公平感发生时,管理者其实还可以有很多挽回公平的做法,比如充分的解释、倾听等。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最大的问题就是共同方法偏差,有待于将来的研究中采用多种方法研究这种负面行为,如同伴评价、上级评价等,有助于提高信息的全面性,以更加严密地验证变量之间的关系。另外,本研究的管理滥用研究工具来自西方,我们还需要继续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下,现代企业管理者管理滥用的行为表现和动机是否具有特殊性。虽然 Tepper 对这一概念有了很好的界定和可操作性见解,而我们的分析也表明问卷解释了 62% 的变异,但问卷还是难免在文化特点上有一定局限性。

同时探讨管理滥用的前因变量对管理实践有更大的指导意义。虽然本研究中在这一概念上强调的是员工对管理者行为中自带的敌意的知觉程度,但管理滥用行为发生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这些行为为什么会发生,也是将来的研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话题。

## 5 结论

本研究探讨管理滥用对员工组织报复行为的作用机制,主要得出以下的结论:

(1) 管理滥用对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员工知觉到的滥用行为越多,感受到的不公平感越强。同时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对报复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

(2) 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部分中介了管理滥用对报复行为的作用。分配公平与报复行为的相关不显著,所以没有起到中介作用。

(3) 负性情感在管理滥用和员工组织报复行

为的关系中起到调节的作用,也就是在负性情感强烈的个体中间,管理滥用和员工组织报复行为之间的关系更强。

## 6 参考文献

- [1] 李超平,孟慧,时勤. 变革型领导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J]. 心理科学, 2006(01)
- [2] 独风稳. 魅力型领导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研究[D]. 苏州大学, 2009
- [3] 李楠楠,陈伟娜,凌文轮. 组织中的不当督导及相关研究[J]. 心理科学进展, 2009(05)
- [4] 吴隆增,刘军,刘刚. 辱虐管理与员工表现:传统性与信任的作用[J]. 心理学报, 2009(06)
- [5] Bennett J T. Consequences of abusive supervis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3 (2): 178
- [6] Skarlicki D P, Folger R. Retaliation in the Workplace: The Roles of Distributive, Procedural, and Interactional Justice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7, 82(3): 434-443
- [7] 皮永华,宝贡敏. 西方组织报复行为理论研究述评[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6(03)
- [8] Tepper B J. Abusive supervision in work organizations: review, synthesis, and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7, vol. 33: 261-289
- [9] Tepper B J, Henle C A, Lambert L S, et al.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subordinates' organization deviance[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8, 93(4):721
- [10] 龙立荣,刘亚. 组织不公正及其效果研究述评[J]. 心理科学进展, 2004(04)
- [11] Mitchell M S, Ambrose M L.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workplace deviance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negative reciprocity beliefs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7, 92(4):1159
- [12] Daniel P S, Robert F, Paul T. Personality as a moderato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irness and retali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9, 42(1):100
- [13] 温忠麟,侯杰泰,张雷. 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 心理学报, 2005(02)
- [14] Cropanzano R, Ambrose M L. Procedural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are more similar than you think: A monistic perspective and a research agenda [J]. *Advances in organizational justice*, 2001:119
- [15] Kennedy D B, Homant R J, Homant M R. Perception of injustice as a predictor of support for workplace aggress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2004, 18(3):323
- [16] Greenberg J. Stealing in the name of justice: Informational and interpersonal moderators of theft reactions to underpayment inequity [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3, 54(1):81
- [17] 颜爱民,高莹. 辱虐管理对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影响: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0(06)

# THE EFFECT OF ABUSIVE SUPERVISION ON ORGANIZATIONAL RETALIATORY

GAO Yan<sup>1)</sup> YAN Gonggu<sup>2)</sup>

(1) School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hai, 519085, Zhuhai, China;

2) School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100875, Beiji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effect of abusive supervision on Organizational Retaliatory Behavior in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through a survey. Result showed that abusive supervision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Organizational Retaliatory Behavior and the perception of justice are partial mediated between this relationship, employee's negative affectivity is moder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Key words** abusive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al retaliatory behavior; justice

# 当代乡村婚姻文化变迁的人类学研究

## ——基于粤北南雄三村的田野调查

马 丽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政治理论教研部, 519085, 广东, 珠海)

**摘要** 近半个世纪以来,粤北南雄农村婚姻家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中可以透视中国乡土社会变化的一种模式。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以随机抽取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对粤北南雄市区的雄州、黎口两镇及附近的珠玑镇等地的乡村为研究区域,描述其婚姻的变迁状况,探讨其婚姻变迁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上的诸种原因,并由此透视半个世纪以来的地方社会文化变迁面貌。研究发现:通婚的范围、年龄差异都较以前有了一些变化,例如,嫁入本地的妇女来源地范围扩大,男女双方年龄也有缩小的趋势;婚姻双方相识途径也有变化,过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在更多的是随着交往的频繁,男女双方自行结识、自由交往。

**关键词** 粤北农村; 乡土社会; 婚姻; 婚姻文化; 人类学研究

### 1 引言与调查地概况

婚姻是人类社会两性结合的基本形式和制度,家庭是通过婚姻建立的两性生活组织和血缘组织,它是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集合体,又是社会文化的载体。家庭存在于文明社会的大多数时空范畴,是现代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变迁同时也反映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关于婚姻家庭方面,已有很多学者作了相关的研究。费孝通先生的《生育制度》,对乡土中国的婚姻家庭有过深入分析;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对江村的家庭也有过详细的描述,内容涉及家庭的结构和规模,家庭功能与家庭关系,同时也描述了江村的婚姻风俗。20世纪30年代,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卜凯(J·Lossing Buck)组织该系师生在我国南北22个省对38256户农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并邀请诺斯坦(Frank A·Notestein)教授根据调查材料写成人人口专章,该章对家庭结构与家庭规模、婚姻状况都有叙述。为我国解放前的传统婚姻家庭状况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但描述性材料较多,解释和分析不足;解放后,曾有美国芝加哥大学的W·L·帕里许和密西根大学的M·K·怀特根据大陆赴港人员提供的资料写成《当代中国的乡村与婚姻》一书,书中有一章专述农村的家庭组织和礼仪生活,内容包括家庭户的结构,结婚和离婚,家庭网,妇女角色的变化等。

描述内容广,也较为详尽。但由于作者并未做田野调查,成书所用的皆是二手资料,在内容的准确性和解释的恰当性上仍可作改进。本文所述粤北南雄地区位于粤赣交界处,集广东客家与中原民情于一身,在这样的地区的婚姻方面研究较少,本文暂且抛砖引玉。本文所述的粤北南雄农村婚姻家庭近半个世纪以来随时代所发生的变化也正是当地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本文试图从粤北农村婚姻家庭的角度来阐明当地社会文化变迁面貌,从而透视中国乡土社会的变化的一种模式。

南雄市地处广东省北部,大庾岭南麓。东连江西省信丰县、东南接全南县、南接龙南县,西南毗邻始兴县,西邻曲江县,西北隅与仁化县接壤,北连江西大余县。四周群山环抱,中为丘陵,被称为“南雄盆地”,自古就是从中原进入岭南的要道。这里的风俗民情既是中原与岭南文化的融合,也是粤赣之间民情的交汇。南雄主要以汉族为主,婚俗也是传统的南方汉族婚俗模式,不少乡镇是客家人居住地,客家的风俗民情在这里也可以得到体现。南雄市下辖12个乡,11个镇,此次田野涉及其中的黎口镇荆岗村、珠玑镇珠玑村和全安乡的乡土社会,笔者通过与村民的访谈、收集当地官方和民间相关资料等为手段,考察其婚姻家庭的变迁,其中包括通婚圈的变化、夫妻年龄差的变化、婚礼仪式的变化等诸方面。

珠玑镇地处南雄市北面,距市区仅9公里,东

邻邓坊镇、湖口镇,南邻黎口镇、雄州镇,西邻全安镇、帽子峰镇,北邻梅岭镇。新老 323 线穿境而过,规划中的韶赣铁路也经过珠玑,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全镇总面积 179.5 平方公里,辖 17 个村民委员会,1 个居民委员会,179 个行政村,总人口 34037 人,镇区人口 6164 人。珠玑巷是其一个管理区,也是镇政府所在地。

黎口镇位于南雄市城区的东郊,国道 323 线东南侧,是城乡结合部,浈江河穿越而过,水陆交通方便,环境优美。全镇总面积 71.3 平方公里,辖 8 个村委会,126 个自然村和一条街道,总人口 21 176 人。荆岗村是其一个普通管理区。

全安镇位于南雄市区西北部,距市区 3 公里,毗邻雄州、古市、始兴县马市镇、百顺、澜河、帽子峰、珠玑等地,管辖密下水、荔迳、杨沥、河塘、王亭石、全安、古塘、羊角、陂头、黄岭、苍石、大坪、兰溪、章禾洞、龙华山等 15 个村委会和 2 个居民委员会,156 个村民小组,5 845 户,26 009 人口,劳动力 10 707 人。密下水是其较大的一个管理区。

## 2 通婚圈的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粤北农村社会文化也发生着变迁,婚姻家庭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方面,其变化也管中窥豹式地反映着当地社会文化的变化。

近半纪世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粤北农村通婚圈迅速扩大,下面是笔者在全安乡密下水管理区随机抽取的样本数据。全安乡密下水管理区石段村共 52 户,从其中随机抽取了 50 户,共 272 人,其中,1960—1969 年间出生的嫁入妇女有 21 人,其来源地分布如下表所示。

表 1

嫁入妇女来源地	本村	本镇	本县	外省
婚姻数量(对)	2	8	11	0

如表 1 所示,1960—1969 年出生这部分人结婚年代大致在 1980—1990 之间,此时通婚范围主要集中在本镇本县,占这一年龄段婚姻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强,而没有出现跨省婚姻。

而在 1970—1983 年这段时间内出生的嫁入妇女来源情况则与表 1 情况有所不同,表 2 是全安乡密下水管理区石段村所抽取的 50 户 272 人中这一年龄段的嫁入妇女来源分布。

表 2

嫁入妇女来源地	本村	本镇	本县	外省
婚姻数量(对)	4	1	14	5

表 2 中所反映出来的通婚圈范围与表一相比,已经扩大,跨省婚姻出现了 5 例,占本年龄段

嫁入妇女总数的 1/5,本镇内的婚姻也大为降低,仅有一例,而本县内的婚姻仍占绝对优势。

这种变化是随村民生活交往的圈子扩大而扩大的。表 2 所统计的婚姻大致是在近十年内缔结的,即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时期以来,粤北农村大量青年南下珠三角务工,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外省女子纳入了其人际交往圈,交往圈的扩大也直接地导致了通婚圈的扩大。

从当地嫁出妇女方面来看,也能看出这种变化,但是与嫁入妇女情况并不完全一致。如表 3 所示,是所抽的 50 户 272 人中在 1960—1969 年出生的已出嫁妇女的嫁往地分布情况:

表 3

嫁往地范围	本村	本镇	本县	本省	外省
婚姻数量	1	0	10	3	0

272 人中有 14 人是这一年龄段的从当地嫁出的妇女,在本县内通婚所占比例最大,占百分之七十强,本省内有三例,而且这三例全是嫁往邻县与南雄接壤的那个村子。而在 1970—1983 年出生的年龄段,则又是另一种情况,具体见表 4:

表 4

嫁往地范围	本村	本镇	本县	本省	外省
婚姻数量	1	2	9	0	1

从表 4 可看到,272 人中这一年龄段的从当地嫁出的妇女有 13 人,出现了跨省婚姻,虽然仅有一例,而没有一例是嫁往本省其他地方的,在本县内通婚的人数仍占最大比例,近 70%。

嫁出妇女通婚圈的扩大表现得并没有嫁入妇女那样明显,这并不是偶然的,当地女子并不愿意远嫁。而且,在因本地男青年外出珠三角务工而导致的为数不少的外省女子嫁入粤北农村的同时,当地女青年虽然也大量外出务工,但是她们大多数拒绝嫁往湖南、四川、湖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一方面,有经济上的因素,在访谈中,笔者发现,在当地人的意识中,湖南、四川等内陆省份农村生活水平远不如粤北农村,当地女青年认为嫁到那些地方去还不如嫁本村。在访谈对象中就有一位刚结婚不久的女青年,她与丈夫也是外出务工时开始交往的,但是其丈夫是邻村人,在选择外省还是本地对象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选择嫁在本地。另一方面,当地传统观念中,远嫁他乡并非值得颂扬的事情,人们往往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将女儿嫁往遥远的异乡。由于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当地妇女在人际交往圈扩大的同时没有相应地导致通婚圈同幅度地扩大,当地妇女外嫁的通婚圈变化比嫁入妇女要小得多。

在夫妻年龄差方面,也表现出随时代变迁而变化的情况,表5、表6是全安乡杨沥管理区杨沥村和密下水石段村夫妻年龄差相关数据。杨沥村

共54户,共计194人,其中有夫妻53对,密下水石段村共52户,从中随机抽取50户,共272人,共有64对夫妻。其夫妻年龄差如表5、6所示:

表5(表格中数据为婚姻数量)

男方出生年份	男方年龄大于女方年龄/年										女方年龄大于男方年龄/年											
	0岁	1岁	2岁	3岁	4岁	5岁	6岁	7岁	8岁	9岁	10岁	0岁	1岁	2岁	3岁	4岁	5岁	6岁	7岁	8岁	9岁	10岁
1934年以前				1	1													1				
1935—1944					1							1										
1945—1954	2	1		1	1				1			1	1	3		1			1			
1955—1964		1	2		1			1		1				2								
1965—1974	1	3	2	1	1	2						2		2	1	1						
1975年以后	2	4	1									1	1	1	1							

表6

男方出生年份	男方年龄大于女方年龄/年										女方年龄大于男方年龄/年											
	0岁	1岁	2岁	3岁	4岁	5岁	6岁	7岁	8岁	9岁	10岁	0岁	1岁	2岁	3岁	4岁	5岁	6岁	7岁	8岁	9岁	10岁
1935—1944			3					1											1			
1945—1954		3	1																	1		
1955—1964	1	1			1	1				1		1	1	1								
1965—1974	2	1	3	1	1							3	1									
1975年以后	2	1	7	2		1		2				1	5	4	2							
	1	2	1										2									

从表5、表6中,可以看到,两个村的情况相似,女方比男方年龄大的情况所占的比重并不小,两个村都是接近百分之四十。但这种情况在年纪较大的夫妻中则不是太普遍。在访谈中,村民们说40—50年代到60年代出生的人们青年时代正好生活在人民公社时代,那时劳动力的多少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女方家一般不会让女儿太早出嫁,因为一旦女儿嫁出去家里就失去一个青年劳动力了。但无论如何,时间或许会因此晚一些,她们终究还得出嫁,当她们年龄愈来愈大,所能选择的正常配偶范围<sup>①</sup>却在缩小,常常被迫选择年龄比自己大的男青年。而从男方家庭方面看,他们希望家中的男青年尽早结婚,娶进来的媳妇可以成为家里新添的劳动力。这样,男方早娶女方晚嫁,男女双方家庭的意愿都正好为女方年龄大于男方的婚姻提供了外部条件。

另外,更为年轻的群体中,夫妻年龄差也有缩小的趋势,1975年以后出生的所统计人口中,两个村都没有一例是夫妻年龄差达到五岁以上,而在1975年以前出生的群体中则存在着。而且,1975年以后出生的群体中女方年龄大于男方年龄的婚姻数量占同年龄组婚姻总量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这应与通婚范围的扩大有关,通婚的空间范围扩大了,可选择的婚配对象也多了,夫妻双

方的年龄差便愈趋小。1975年以后出生的人青年时期已处在改革开放后的时代,外出读书和务工使他们的人际交往圈子扩大,通婚范围及可选择的婚配对象范围也随之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夫妻双方的年龄差也就趋于传统上所认同的模式靠拢,女方年龄大于男方年龄的情况也渐渐地少了。

### 3 婚姻缔结双方认识途径的变化

从访谈中,我们发现不同年龄的人们缔结婚姻的双方认识途径也随时代而变。在传统中国社会男女结合是“非媒不娶,非媒不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而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明确规定婚姻关系的缔结是男女当事人在自己相识的基础上,通过接触了解的自愿结合。村中七十多岁的老人,即在新中国成立前结婚的老人不少是传统的专职媒人撮合的,访谈中黎口镇荆岗村一梁姓老人,珠玑巷一雷姓老人都是此情形。

新中国成立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结婚的人们则比较多是由亲戚朋友做媒而撮合成,而不再有专职的媒人。一般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热心的亲戚朋友熟悉男女双方,知其双方都已至婚龄而未论婚嫁,并且认为双方相般配,于是充当红娘介绍双方认识;另一种是男女双方已认识,但不熟

① 即中国传统上大多数人所认同的男方年龄大于女方年龄的配偶模式。

悉,其中一方央熟悉双方的亲戚朋友做媒,使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媒人的非专业化是这一阶段的变化特点。

而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男女双方自行结识、自由交往直至缔结婚姻的情形比较多。尤其是90年代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发展,粤北农村成为劳动力重要输出地之一。不少年轻人外出打工,使得人际交往范围扩大了。在打工期间双方认识交往至结婚的例子在这一时期不在少数。有的双方恰是同乡(来自同一市县、同一镇甚至同一村),也有不少是有一方来自四川、湖南、湖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在此次田野调查中,就发现不少嫁入的外地妇女,都是在打工时认识本地青年而嫁入的。在珠玑巷村,就发现一湖南籍妇女,却已说得一口流利的珠玑方言,若非旁人提及,熟悉珠玑地方言的笔者也完全听不出是湖南人。由于她嫁到本地已近十年,所以对当地方言已运用自如了。另外,就在珠玑巷做田野调查过程中,笔者就恰好碰上有一家正在举行婚宴,男方是珠玑巷人,女方是安徽人,双方也是在外打工期间认识的。

而一般来说,婚姻双方结识途径反映出婚姻当事人在婚姻中的自主性以及婚姻自由的程度,当地调查所显示出来的趋势明显地反映了婚姻自主自由程度的随时代加强的情况。

另一方面,从女方来看,本地籍的女青年因打工而外嫁的则比较少,大多数都是嫁本地人。在珠玑巷一陈姓人家,去年大女儿刚出嫁,嫁的是本镇长迳村人。双方本是珠玑中学校友,男方高女方一届,后一同去深圳打工,两年后回乡务农,并结婚。其母告诉笔者说大女儿不愿远嫁,远嫁他乡倘若婆媳关系紧张,却无娘家可依靠,且打工时认识的不少男青年都是来自内地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农村,在她的观念中,外省农村生活水平还不如本地,所以她更不愿嫁外省。在访谈中,持此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即女儿远嫁外省还不如嫁本地。

## 4 婚礼的变化

婚姻缔结的外在表现——婚礼,也随社会发展发生着变化。现在农村年轻人基本都外出读书或打工,留在农村务农的极少,因而大多数娶的也都是外地女子,娶亲仪式也因此而与传统的仪式

有些不同。由于女方家在外地,而且大多是远在外省,男方向女方送“三牲”等礼则改为送礼金。接亲也不是从女方的娘家接过来,笔者在珠玑巷所见之婚礼中,男方租来小轿车从一家新娘化妆店把化好妆的新娘接进男方所在宗祠。其他礼节还是与娶本地女子相同,在宗祠门前由事先请来的“好命人”接进去,并且过“磨蓝”(由儿童拿着的米桶米筛称为“磨蓝”),然后在宗祠拜祖先,拜男方父母。之后由于新娘未带娘家弟妹过来,新郎向小舅子小姨子讨衣柜钥匙这一环节也省去了。宴请宾客现在农村仍按旧俗在祠堂摆酒席,只有极少数是到酒楼包餐。访谈中,村民们普遍认为去酒楼花费高,且口味不太合,因而一般都在祠堂摆酒席,从村里请人来帮厨。宴席中,新郎新娘先是在新房里喝交杯酒,接着出来给宾客斟酒。

对比传统的婚礼,现在许多仪式愈来愈走向简化,乡土社会也如此。传统的“铺房”、“暖轿”、“行开眉礼”、“催妆”<sup>①</sup>等或省去或简化,尤其是现在在农村有不少是娶外地女子,仪式中与女方娘家有关的环节几乎全省略了。

传统上,以婚礼仪式缔结婚姻的形式已得到人们的认可,《婚姻法》颁布后,大多数中国人法律婚和习惯婚并行,即既登记领取结婚证,又举行婚礼宴请宾客。在此次田野中,笔者发现有少数人只行习惯婚,不领结婚证。他们一般是在20多30岁左右,在外打工时认识,女方往往是较远的外省人,若要领结婚证,双方必须到女方户口所在地去将户口迁出。由于路途较远,且双方都不看重结婚证,认为婚姻稳定在于夫妻双方感情基础好,而不在于是否有一纸结婚证。而同村其他村民则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不领结婚证可能是女方并未打算长期维持这段婚姻,方便自己将来离去<sup>②</sup>;也有的认为不领结婚证男方可以随时弃妻离去,女方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但当事人却对此并不太在乎,这大概与他们外出务工的经历有关。在珠玑村做访谈时有一位近40岁的男子,他与前妻分开几年了,他们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在珠三角务工时相识的。当初他们的结合并未按法律程序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仅仅是请了部分亲友而已。后来其妻继续在珠三角打工,而他则回乡,虽然那时他们已有两个孩子,但他们并未补办结婚

① 《南雄县志》1991年版 第三章《风俗》第四节《婚丧喜庆》

② 显然,这是站在同村人的立场猜度外人的想法。如果双方婚姻不能维持,女方一般是受害较大的一方,但他们的言语中却存在着明显的偏颇。

证,孩子随母亲留在珠三角。因为两人分居两地,婚姻有名无实,其妻也赞成他再娶。像这样的例子在一个村子里就有好几例。

## 5 妇女首胎生育年龄的变化

妇女首胎生育年龄也随时代而发生着变化。表7是全安乡密下水区石段村60个妇女的首胎生育年龄数据。该村共52户,从中随机抽取50户,共272人,共有64对夫妻,其中又有60对已生育夫妻,其女方首胎生育年龄如下表所示:

从表7中可以看到,低于20岁生育的两例均在1955—1964年出生这一年龄段,到了1965—

1974年出生这一年龄段,生育年龄则往后推移了,这一年龄段24人中就有18人是大于25岁生育的,占这一年龄段总数的75%。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结婚年龄的推迟直接导致了生育年龄的后移。在当地,男尊女卑现象并不很严重,不少女孩子同样普遍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而且她们中为数不少被供上大中专院校。在访谈中,很多村民也支持女孩接受高等教育,他们普遍表示,在供孩子受教育方面并不会因男女性别不同而有所偏倚,自己的女儿只要愿意读书,而且能够考上更高级院校,他们也会尽己所能供其完成学业。

表7(表格中数据为妇女数量)

女方出生年份	首胎生育年龄																					
	<20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1934年以前					1		1									1						
1935—1944年			1			1			1	1			1					1				
1945—1954年		2			1	2	2															
1955—1964年	2	1	1	1	2	2			2													
1965—1974年			2	2		2	2	5	2	2	4		1	1	1							
1975年以后		1	1	3				1	1	1	1											

总之,近半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婚姻家庭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方面,成为体现这种变化的一个窗口。粤北农村作为广东与中原的连接点,这种变迁体现了乡土中国随时代发展而呈现出来的变化特征。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村与城市变迁的形式和趋势并不完全一致,而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 AN ANTHROPOLOGY RESEARCH ON CULTURE OF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VILLAGE: BASIS ON THE FIELDWORK IN THREE VILLAGE IN NANXIONG OF NORTH CANTON

MA Li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The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hai, 519085 Zhuhai,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fieldwork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e research chooses the villages in the town of XiongZhou, LiKou and ZhuJi of NanXiong in North Canton as the research area. After describing the changes of marriage in these areas, the article argues the reasons of change in marriage from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culture, and society, then it refracts the changes in local society since the latest half century.

**Key words** local society; marriage; change

## 6 参考文献

- [1] 杨善华. 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农村的家庭与婚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2] 张德强. 嬗变中的婚姻家庭[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
- [3] 雷洁琼. 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 [4] 谭深. 家庭社会学研究概述[J]. 社会学研究,1996(2)

# 珠海微博舆情传播特性分析

赵华安<sup>1)</sup> 李传忠<sup>2)</sup> 许育秀<sup>2)</sup>

(1)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政治理论教研部,519085,广东,珠海;

2)《珠江晚报》社政经部,519085,广东,珠海)

**摘要** 珠海微博舆情数量较少,而且具有焦点散、强度低等特点,除了发生在珠海且足以吸引全国眼球的公共事件并不多见,珠海地方政府对舆情的重视及积极应对以外,还应该从本地微博应用的基本特点上寻找。调查发现,在珠海,在校大学生、中产白领和专业人士为主要的微博用户群体,多方面的原因共同导致了珠海本地微博主要应用群体在舆情的发生方面扮演着并非积极的角色;而且当地微博应用具有用户的特定化、以强连带传播为主、意见领袖的弱化等基本特征。与此相应,珠海地区的微博舆情就形成了地方化、群组易于对立、传统媒体作用凸显等基本传播态势。

**关键词** 珠海;微博舆情;强连带;传统媒体;意见领袖

微博舆情实质上就是发生在微博这一网络平台上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它起源于某一公共事件,作用于微博平台,参与主体是微博用户,针对的是政府及相关公共权力部门。微博舆情之所以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微博用户数量庞大且仍在不断增长;二是针对公共权力部门,广泛影响着人们对政府的态度和看法;三是微博舆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现实中的群体性事件。

## 1 珠海微博应用的基本特征

珠海并非是一个微博舆情多发地方。造成这样现象的原因,除了是发生在珠海且足以吸引全国眼球的公共事件并不多见,珠海地方政府对舆情的重视及积极应对以外,还应该从本地微博应用的基本特点上寻找。

### 1.1 在校大学生、中产白领和专业人士为主的微博用户群体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指出:国外最大的微博平台 Twitter 用户主要分布地区是一、二线城市,年龄主要集中在 20 岁至 50 岁的上班族;在国内的最大微博平台新浪微博中,用户也主要集中在发达城市,以名人、草根(年轻)及公司机构为主<sup>[1]</sup>。

珠海市的人口构成则可能进一步强化了微博用户向年轻人、精英阶层集中的趋向。据珠海统

计局公布的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关于珠海市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市常住人口为 156 万多人,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特点,即少年和老年的人口比重较低,劳动力年龄人口比重较高,15~64 岁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超过 80%,达 127 万多人。另一组数据则显示珠海常住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大学(指大专以上)程度人口逾 28 万,高中(含中专)程度的人口逾 38 万,两者相加约合 66 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总数接近一半;与 2000 年时候的数据相比,每 10 万人中具有大学程度的从 7 503 人上升到 8 389 人,均高于全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sup>[2]</sup>。这样的一种人口构成,一方面源于珠海近些年大力推进产业升级转型,着力发展高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等“三高”产业,吸引了大量高学历人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得在校大学生人数迅速增长,珠海现在已经成为继广州市之后,广东省内在校大学生人数排名第二的城市。

在校大学生、中产白领和专业人士在微博的使用上会显示出与一般用户不同的一些特性:一方面,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因此相对理性,不易为偏激言论所左右,从而降低了谣言传播的可能和空间;另一方面,出于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的考虑,中产白领和专业人士的言辞和行为不至于十分激烈,而在校大学生主要关注宏观(国家民族)

和微观(自身利益)的问题,缺乏对中观(地方事务)问题的兴趣,多方面的原因共同导致了珠海本地微博主要应用群体在舆情的发生方面扮演着并非积极的角色。

**1.2 强连带为主的微博传播模式** 微博用户往往出于不同的信息获取需要以及自我偏好而相互聚合,形成一个个微博群体,称之为微群。不同的微群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或紧密,或松散,前者称之为强连带,即双方相互间交流互动频繁,形成紧密的关系,后者称之为弱连带,就是成员相互间的联系较少,有特殊需要时才会发生联系。

Ingrid Erickson 的研究发现, Twitter 因只有转发回复功能而更似于一个广播平台,带有评论功能的 Jaiku 则是一个人际交往平台<sup>[3]</sup>。国内的微博,如新浪,兼备转发和评论的功能,但由于微博用户粉丝数量的多寡也影响着微群的聚集方式和信息传播<sup>[4]</sup>。在大量粉丝聚集的微群中,更利于信息的广泛传播,却不利于用户之间的充分交流,用户之间呈现弱连带关系;而粉丝量少的微群中,用户之间能更好地交流互动,形成强连带关系。

珠海本地微群的信息传播,呈现较为明显的强连带方式。以“海滨泳场改名”一事为例,2012年5月下旬,传出本地市民熟悉的休闲场所海滨泳场将更名为情侣滩的消息后,引起了本地网友在微博和网络论坛的热议,其中网名“珠海小黎”的网友同时在微博和本地“百岛论坛”的发言尤为突出,引起了网友们的围观和媒体的广泛报导。5月18日经本地媒体披露消息后,“珠海小黎”同时在微博和论坛上发帖抗议,其中于18日上午更是两次在个人微博发布相关信息,第一条微博发布于9点46分,20人转发,27条评论,其中4条是“珠海小黎”的回应;第二条微博发布于10点07分,58人转发,40条评论,其中11条是“珠海小黎”的回应。与此同时,“珠海小黎”在“百岛论坛”上的发帖引来了过千点击率和大量的跟帖回复,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网络围观效应。“珠海小黎”的粉丝数不算多,只有2308人(数据截止至2012年7月31日)。

但是,强连带总体上并不利于信息在微博的广泛传播,相反,弱连带却有利于信息传播,因此,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认为:“强连带往往形成小圈子,弱连带却会形成一张大网络。”<sup>[5]</sup>那么珠海本

地的微博用户和群体为何易于结成强连带关系呢?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取决于用户数量的多少,庞大的用户数量更易于形成一张大的社会网络,构建起用户间的弱连带关系,而少量的用户更喜欢“抱团”,显然总人口数和网民数量的狭小,使得珠海本地的微博用户规模不可能与深圳、广州等大城市相比。二是取决于话题是否有足够的广泛性,当话题不足以撩起大多数用户的兴趣时,大家宁愿自行其是,讨论圈子内部的事情。

**1.3 意见领袖影响力的弱化** 所谓的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是指在群众中具有一定权威性与代表性的人物,他们首先接触大众传播媒介,再将从媒介上获得的信息加上自己的见解,传播给他们周围的人,从而对周围的人施加影响。信息的传播是沿着大众传播媒介——意见领袖——一般受众的“二级传播”过程而完成的<sup>[6]</sup>。

微博为意见领袖突破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和话语霸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工具。当前国内发生的众多网络公共事件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意见领袖活跃的身影。但是在珠海本地微博平台上,意见领袖的形象反而还相当“模糊”。

要想成为微博世界里的意见领袖,必须具备一定的外在条件,正如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谢耘耕教授所言:“微博用户的粉丝数能够代表其网络影响力,而被转载与评论的次数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微博意见领袖所发信息在事件中的扩散度和影响力。”<sup>[7]</sup>以此为标准,我们来考量一下珠海微博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在2012年5、6月间,珠海市政府推行的“禁电”(禁止电动车上路行驶)引起了网友们在微博上的热议。为此,市政府于6月7日邀请了12名珠海网民代表进行座谈,征集网络民意。这12名网民都是珠海本地知名网友,常在本地微博和论坛上就各类公共事件发声。在当天的座谈会上,共有10人就“禁电”问题发言,媒体摘录报道了其中9人的言论。考察这9人的微博,粉丝数量最多的是政协委员陈利浩,超过15万。其次是名为“珠海上空的鹰”的网友,粉丝数约1.5万,其余7人中,粉丝数在1万左右的有1人,2300~3300的有3位,730~930的3位。这样的数字与某些微博名人动辄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粉丝量相比,确实相形见绌。粉丝量的严重不足确实制约了这些意见领袖言论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再就他们的言论影

响力来看,关于“禁电”一事的评议中,转发数量最多的是陈利浩的一条微博,有229次转发,其次是网友“珠海老周”的一条微博,有58次转发,其余众人关于“禁电”一事的微博转发量,都在50次以下;而评论数,最多的一条也是来自陈利浩,有145条评论,其次是“珠海小黎”的39条,其余的评论数量均不超过20条。珠海本地微博意见领袖的言论扩散度和影响力确实有限。

## 2 珠海微博舆情传播的基本态势

**2.1 微博舆情的地方化趋势** 对于珠海而言,受制于地方微博应用的一些基本特征,微博舆情的发生更具地方色彩。

首先,强连带的信息传播方式使微博话题更显小众化。比如说,“海滨泳场改名”一事,对于很多老香洲而言是事关文化记忆的重大事情,但是对于其他地方的居民来说,改名与否仍旧只是个地名的符号。又如,北师大珠海分校的学生们强烈反对的高架桥贯穿校园的方案是因为事关他们的切身利益,但是对于其他人,甚至是珠海市民而言,高架桥的建与不建,他们压根就不会有切身的体会。

其次,意见领袖的弱化妨碍了微博舆情的扩散。热点事件必然是具体的,但具体的热点事件背后往往潜藏着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正是这种情绪感染着众人而使得微博舆情得以扩散。而从具体事件中抽象出普遍性情绪,往往需要意见领袖的提炼,意见领袖对于微博舆情扩散的重要作用也正是体现在这里。只是珠海本地微博意见领袖影响力的弱化,妨碍了微博舆情的扩散。在“海滨泳场改名”一事中,我们见到的是“珠海小黎”的就事论事,对“抹杀珠海地名”的质疑,在“金琴高速以高架桥贯穿北师大珠海分校”一事中,我们甚至见不到一名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的参与。在这些本地微博舆情事件中,往往见到的是意见领袖对事件本身的吐槽,而缺乏对事件背后抽象意义的讨论。在充满口水及意见领袖缺席的微博世界里,舆情永远都只会局限在一定的范围。

**2.2 群组之间的对立进一步激化微博舆情** 人们使用微博易于结成群组,群组之间或沟通交流,或对立激辩,二者都可以强化微博舆情。群组间的交流从广度上扩展舆情的范围,而群组间的激辩则在程度上激化了舆情。对于珠海而言,受制

于微博用户总体数量少,且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现实情况,微博舆情一旦发生,在广度上的扩展将十分有限,我们尤为要注意的是群组间的激辩可能对微博舆情发展的推波助澜作用。例如在“禁电”一事中,本地微博呈现一片反对的声音,网友“珠海老王”在市政府座谈会及自己的微博上透露了另一种声音,在一些“妈妈群组”中,“90%以上的妈妈都赞成‘禁电’”,原因包括超速、对孩子造成惊吓以及各种马路乱象等等。而在“金琴高速以高架桥贯穿北师大珠海分校”一事中,这种群组之间的对立更是掀起本地微博长达一周的舆情风暴。2011年11月12日,正当北师大珠海分校的学生们为高架桥贯穿校园一事而热议的时候,本地媒体一名记者在其加V认证的微博中将150万珠海市民和3万学生对立起来,称金琴高速是一项关系全市居民出行的工程,没有理由只倾听北师大珠海分校学生的意见,而应由全体市民投票表决。此言论一出,立马掀起了本地微博的滔天巨浪,引来了数以千计的转发、数以百计的评论。该事件也吸引了不少珠海本地加V认证的微博用户参与讨论,论战双方均有知名记者和律师的参与。双方阵营互不相让的激辩强化了微博舆情的传播。

为何群组之间的对立会激化微博舆情呢?原因在于背后的群体极化。所谓的群体极化,是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sup>[8]</sup>作为自媒体新形式的微博,实质上大大强化了群体极化效应。微博用户通过关注与被关注的功能,与志同道合者结成群组,凡一致者关注,不一致者忽略,将自我与歧见隔离,人为地屏蔽了与差异性观点接触的机会;另一方面,群组内部的交流实际上并非是思想的碰撞,反而是强化了既有的观点,否则异见者将难以在群组内立足。这种群体的协同过滤使得用户所接触到的信息越来越狭窄,偏激的观点和极端的言论更容易形成,最终导致了整个群体的极端化。群体极化的形成会反过来给予每个成员以自我催化的责任感和自豪感,让发帖者感到自己的信息发布具有崇高的道德意义,给自身的发帖行为赋予了一种自我实现的价值。在这种“担当”意识的驱使下,激发了信息发布的狂欢,加剧了整个微博舆情的骚动。在“金琴高速以

高架桥贯穿北师大珠海分校”一事中,我们看到的是学生们为捍卫校园和高等教育的价值而行动的使命感,而反对者则是扛起了公共利益、言论自由的旗帜进行反击,在彼此双方都认为己方必然正义的感召驱使下,整个本地微博世界也被搅动得翻江倒海。

**2.3 传统媒体在微博舆情传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微博时代,有学者认为,传统的二级传播模式,即信息传播沿着“大众传媒—意见领袖—普通受众”的路径进行将被打破,一级传播将得以实现。因为微博以其低门槛的进入要求,使得“人人可以发声、人人都能做记者”。在这一传播方式下,意见领袖取代了大众传媒集信息的发布与评论于一身,实现了由传统媒介时代的“二级传播”到“一级传播”,即“意见领袖—普通受众”的过程,大大地强化了信息传播速度和舆论影响效果。

但是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珠海本地微博意见领袖影响力的弱化,使得其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和角色降低,相反传统媒体,诸如报纸、广播、电视以及它们在微博平台的延伸,即官方认证微博,除继续扮演着信源角色以外,在一定程度上兼具意见领袖作用,从而强化了对微博舆情传播影响。

首先,传统媒体拥有巨大的舆论影响力。珠海特区报的微博粉丝数有11万多,珠江晚报的超过10万,珠海电视新闻的是7.6万多,南都珠海的也超过4万。在这个粉丝量决定能量的微博世界里,基于微博信息裂变式传播的特点,粉丝数量越多,微博的舆论影响力就越大。仔细分析珠海传统媒体的官方微博粉丝数量,我们会发现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珠海特区报和珠江晚报相差不远,珠海电视新闻居其次,而南都珠海则与珠海特区报与珠江晚报拉开了有2.5倍以上的差距。这些数字背后的差距反映的是传统媒体在“信息源”角色扮演中的重要性差别。人们关注传统媒体,主要是为了获取信息,南都珠海作为市场化媒体以省内大报南方都市报为依托,在信息获取的便捷方面显然比不上专注本地事务的珠海特区报和珠江晚报。而珠海电视新闻与珠海特区报、珠江晚报微博粉丝数量的差距,则体现了平面媒体和立体媒体在信息传播的速度与便利上的差异。

其次,传统媒体能够有效地影响微博的议程设置。以“金琴高速以高架桥贯穿北师大珠海分校”一事为例,早在2011年10月底、11月初的时

候,珠江晚报和南都珠海已经相继披露消息:市交通局认为“高架桥方案”最优,引起了学生们在微博上的热议。至11月10日,媒体采访市交通局有关负责人,确认已经将“高架桥方案”上报,消息一经透露,立马引起了学生的强烈不满,导致了11月11日学生们的签名抗议活动。随后,市交通局于12日召集本地媒体发布消息,宣称路线方案尚未最终确定,试图平息舆情,此间,珠江晚报一名记者利用新闻采访的便利,现场微博直播交通局的新闻通气会,引来了大量的围观和评论。媒体报道了市交通局新闻通气会的相关内容后,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学生们对交通局的责难,但是本地媒体一名记者随后在自己微博上的一番“公投”言论,又立刻将整个舆情再度升温。而正当各方吵得不可开交之际,南都珠海于11月17日连发两篇来论“金琴高速论战正酣,‘有关部门’诸公何在”,“别只是承诺,是骡子是马溜溜看”,试图将微博上的口水仗和人身攻击重新转回至事件本质的讨论,其用意和矛头所指是十分明显的。在这次舆情一波三折的发展过程中,媒体的导向作用十分的抢眼,政府该如何应对和利用本地媒体的这一强大议程设置功能,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 3 参考文献

- [1] 喻国明,等. 微博:一种新传播形态的考察——影响力模型和社会性应用[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97
- [2] 张文单. 珠海公布人口“家底” 珠海常住人口逾156万[N]. 珠江晚报,2011-5-19
- [3] Ingrid Erickson. Geography and community: new forms of interaction among people and place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2010(53):1194
- [4] 赵高辉,王梅芳. 人际扩散:“织里抗税”事件的微博传播模式分析——基于新浪微博的考察[J]. 新闻记者,2012(3):56
- [5] [美]马克格兰诺维特. 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 罗家德,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3
- [6] 周庆山. 传播学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98
- [7] 王平,谢耘耕. 突发公共事件中微博意见领袖的实证研究——以“温州动车事故”为例[J]. 现代传播,2012(3):82
- [8] [美]凯斯桑斯坦. 网络共和国[M]. 黄维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7